



《记忆》103期

目录

【专稿】

天 穹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

【上海文革】

李 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二）

【评论】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二）

【随笔】

胡庄子 革命语境下的粪便

【述往】

李 斌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序跋】

启 之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序与跋

【编读往来】

1. 李逊纠错
2. 陈闯创谈注释
3. 启明谈李逊文
4. 郑文生询问金祖敏情况
5. 余汝信纠武传斌之误

【版权声明】

【专稿】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¹

天穹

在“九一三”事件四十一周年之际，人们多么希望林豆豆向人民、向历史做一个坦诚的交代，她毕竟近七十岁了，时不我待。但是，《林豆豆口述》的出版，却使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经过反复阅读《林豆豆口述》，及多次走访了解林豆豆的人，笔者发现，有三个“关系”，是林豆豆“思想体系”的基础；她的思想认识和她的所写，都是以这三个关系为基础的。这三个关系是：（1）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2）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3）叶群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弄清搞准这三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系弄不清搞不准，是很难研究清楚林豆豆所讲述的具体问题的。

笔者认为林豆豆讲的这三个关系，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够真实的。

一、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



1935年，叶群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与王光美是同班同学。叶群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王光美早参加革命十年。她也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的青春

(上图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之歌。1938年，叶群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秘书、

¹ 本文原载余汝信主编的《“九一三”回望》一书（2013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13年10月，出版人授权《记忆》首发本文的电子版。天穹系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及研究者。

编译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60年恢复军籍后曾授上校军衔，这是与其能力、资历基本相称的。总之，叶群是有她自己的革命经历的。

实事求是地说，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不好，大部分的责任在林豆豆。据说，这种关系不好，最初来自于严慰冰的恶毒攻击的匿名信。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污蔑林彪一家，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关系，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生。林豆豆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内容后，对她打击很大，开始到处寻找她亲妈，搞得林家不得安宁，也严重影响了病重的林彪（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恨不得一枪毙了陆定一，也说明林家受害之深）。生长在这样的革命家庭，林豆豆是不应听信谣言的，豆豆的无知、不冷静实属不智。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刘源说，严慰冰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少奇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还特意到过中南海刘家，看她和刘平平长得像不像，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严慰冰的恶劣行为，不仅伤害了叶群，也污蔑了刘少奇。林豆豆听信了谣言，在家里绝食、闹腾。豆豆闹到什么程度？据叶群亲弟弟叶镇说，一天叶镇接到林豆豆的信，信中说：“舅舅你快来看我呀，我实在精神上受不了了”。叶镇夫妇赶到中关村豆豆住处（此时林豆豆在上大学），豆豆抱住叶镇就大哭说：“舅舅呀，你一定快点找到我的亲妈！”叶镇很生气，说：“豆豆呀，你不能再闹了。这是阶级敌人的陷害！”这也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叶群不是林豆豆亲妈，叶镇还是亲舅舅吗？

其实，林豆豆的行为对叶群这个母亲来说伤害最大！叶群明明是林豆豆的亲妈，但为了林豆豆早日摆脱精神折磨，她还是想尽办法找到知情的警卫员、马伕、挑伕等等，连接生婆都找到了，都找来给林豆豆作证，其实这毫无必要。叶群完全可以说，我就是你亲妈，你再胡闹，随你去吧。叶群这么做，是对林豆豆的迁就和溺爱，不愿林豆豆感情上受伤害。

林豆豆仍然无理取闹，叶群给了她一巴掌，不能说对，也不能算什么大错。叶群本来就是你亲妈嘛！严慰冰的案子破了以后，叶群就“更是”林豆豆的亲妈了。但林豆豆并没有感到愧疚，也没有向母亲道歉，她是知错不认，自己下不来台，反而变本加厉地说叶群的坏话。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为了“保护”林彪，把叶群说成是欺骗林彪出走的祸首，把她和叶群的关系也从家庭内部

问题，演绎成她一直和叶群欺骗和控制林彪斗争的政治对立关系。林豆豆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叶群不是你亲妈，也有养育之恩，也要善待！这就是林豆豆的不孝和任性之处。其实叶群对林豆豆是溺爱的，她在无奈的痛苦中给豆豆起了个外号叫“豆老爷”。林办的秘书认为这个外号很贴切，连林彪有时都扯着嗓子、拖着湖北腔叫“豆老爷”（当然这是林彪对女儿的昵称）。

说叶群对豆豆溺爱，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给她找对象。林豆豆说叶群给她找对象是为了控制她，这纯粹是胡说。你找到了真心爱你的夫君，他能听命于叶群控制你吗？事实证明，张清林从“九一三”事件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听林豆豆的。在此，话不多说，一言以蔽之，在叶群的眼里林豆豆就是女儿，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控制的，林豆豆的说法是自我拔高。据切实了解，林豆豆是早熟的。在那样的年代，在帅府之家，父母要把女儿的婚姻关，应不为过，何况她自己渴望的人或自己交往过的人都是不太适合的。在文革中，叶群四处托人为林豆豆找对象，从政治影响上看确有不妥之处（关心林豆豆的人很多，巴结的人也不少），但从母爱角度来说，叶群是尽心的。

另一个是“九一三”事件。9月12日夜晩，在叶群、林立果携林彪紧急出走时，不见林豆豆。其实，周恩来一来电话，叶群就知道林豆豆“惹事”了，但叶群还是坚持要找到豆豆一起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豆豆已经反叛，但去意已定的叶群还是舍不得丢下自己的骨肉，这是母爱使然。

第三个是林豆豆上大学的经历。豆豆中学在师大女附中，是63级（即1963年高中毕业）。《林豆豆口述》110页写到，她自己“16岁就开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并因此多次休学”。但她却在1962年中学未毕业就提出要上大学。叶群想办法，送她到清华（在自动控制系，与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一班）。刚好1962年中央明令规定，高干子女上大学不许走后门。那个年代，大家都严格遵守，如刘帅的女儿，仅差一分就没能上哈军工而上了北航；贺龙当年气势正盛，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他的儿子贺鹏飞上了清华，但上了录取分最低的机械系就很满足。豆豆提前一年“毕业”，没经高考就上了清华，而且上的是高录取分的自动控制系，可想而知，叶群作为母亲下了多大功夫，担了多少风险！而且，叶群怕豆豆吃苦，不让她住校（那个年代所有高干子弟都住校，和普通人家子女打成一

片)，专门找人在中关村给豆豆安排住宿，保姆王淑媛陪着照顾豆豆生活。豆豆跟班上学很困难（跟不上，严慰冰对她的迫害也是原因），后来又改上北大，结果转到北大也难读下去，只能辍学肄业。1965年到空军参加工作，定为干部，授少尉军衔。看来，不能说叶群对豆豆不好，而是好过头了。豆豆在《空军报》工作，叶群知道豆豆经常在外采访而耽误吃饭，很着急，但林彪这样的帅府家庭毕竟不太识“人间烟火”，有些不知所措。当她知道商店里有高价点心出售时（不要粮票），亲自去买了点心，装在一个铝饭盒里给豆豆送去。

第四个是，叶群时时关心林豆豆和林立果的生活。林彪身体很差，消耗了叶群很大精力，但她很关心这两个孩子。林彪、叶群一年之中，很长时间在外，每次外出，她都让其弟弟叶镇夫妇来毛家湾照顾豆豆和林立果。

总之，把叶群说得再“坏”，她对待林豆豆并不坏，而是关心和忍让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林立果因林豆豆石破天惊的报告引起中央警觉而由周恩来询查，使叶群乱了方寸而“仓皇出逃”，陨命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四十一年，快半个世纪了。林豆豆最不该的是，她不但不自责，还出书编假话诋毁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九一三”事件，林豆豆毫无反省，也没有给林彪正名的具体行动；四十一年来，毫无建树。现在可好，出了一个《林豆豆口述》，不但伤害了林彪、叶群，也伤害了真实的历史，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谷底。

其实，在老干部的夫人们中，叶群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方面是超前的，知识也是不错的。比如她懂俄语，这是苦学而来的。报刊多次登过叶群翻译的文章，如1948年9月21日就登了一篇叶群翻译的《必须要学会总结经验》（克·希达列夫著）；她练毛笔字（赵孟頫体），也是下过功夫的。1962年6月3日，她署名叶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古代一位优秀战略家——陆逊》的文章，不仅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分析得很到位，还提出富国、强兵、爱民是克敌制胜的根本，这样的水平在高级干部的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叶群常请人给她讲课，汲取各方面知识，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夫人做不到的。

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一是林豆豆写得不实；二是她们关系的好坏，也左右不了什么政治大事（“九一三”除外），林豆豆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要了。

我们研究一个人，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判断和认识。叶群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

是能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顶尖人物近距离接触的人，我们要在这个范围内衡量叶群才有意义。

因此，这里想厘清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并不是要做个判官来判定他们母女之间的是非恩怨，而是想揭示出叶群的基本面目。不能对其“妖魔化”，因为这种基本面的“妖魔化”，是要影响对叶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为的判断的。

二、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

林豆豆是林彪家人，但家人并不等于就是林彪政治活动的“当事人”。豆豆往往用含糊的概念“我们”二字，把自己涵盖进林彪的工作中，以及林彪和党的领导人、高级干部的交往中来。在把“家人”置换成“当事人”后，就绘声绘色、“亲临其境”地论述政治大事。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早就对林豆豆习惯性地用“我们”一词提出质疑。罗点点深有体会地说，林豆豆和人谈话的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的问题不做正面回答，……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好像是指她和林彪”。林豆豆是1944年生人，她谈政治上的“大事”，常常从1964年说起。那时她才20岁，还在上学，对于林彪、叶群、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等革命前辈来说，林豆豆应该不在她说的“我们”之中；对于“很多林办秘书”，“全体林办秘书”来说，豆豆应该也不在“我们”之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陷阱：你不相信吧，她是林彪的女儿；你相信吧，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豆豆和林彪就是父女关系，可是在林豆豆口中，他和林彪的关系几乎上升到“亲密战友”的关系，某某事“我和林彪的看法是一致的”，某某事“我和林彪都不知道”。林豆豆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究竟林彪“在病重时”对林豆豆的嘱托是什么？不得而知。林彪既然病重，不向中央报告，不向军委嘱托，不向军委办事组嘱托，而向林豆豆嘱托，这绝不符合林彪的党性原则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林豆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拿王淑媛来印证她的话，或者说她的话是从王淑媛那里听来的，因为王淑媛是能接近林彪的。王淑媛原来是幼儿园的阿姨，后调

到毛家湾来工作。我们并不否认她是一位优秀可靠的共产党员，但她的工作性质就是公务员（保姆）的工作。她并不负责照顾林彪的生活，林彪的衣食起居也不归她管，林彪的生活有李文普为首的警卫人员管理。林彪和党内、军内领导同志谈工作，王淑媛是绝对不可能参与其中的。林彪是极为严谨的人，是不会对王淑媛说什么的，她连秘书办公室都没有进去过，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大事的。当然，王淑媛生活在毛家湾，林彪、叶群讲过的只言片语，王淑媛是可能听到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如果把王淑媛听到的只言片语作为林彪对某个重要问题看法的依据，是绝对错误的。林豆豆常抬出王淑媛，只是她的障眼法而已。

据林办秘书介绍，林办秘书根本没有给林豆豆讲过什么“公事”、“大事”。 “林立果回家来，还爱到办公室走走，打听一些消息；林豆豆很少来办公室，也不打听什么消息。”其实林豆豆讲从林办秘书处得到的如何如何之事，大都是自己从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而已。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林豆豆是林彪家庭的一员，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的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的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三、叶群和林彪的关系

文革后，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把毛和江青切割。林豆豆为了护林，也机械



地仿照；如此这般地切割，结果适得其反。江青在文革中的作为，总体上无疑是和毛一致、和毛有关的。但江青有独立的工作（如文艺、宣传、中央专案等），有大量独立的讲话，这些工作和讲话未必毛泽东事事都知道。叶群没有中央分配的独立的工作，她的工作几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联（上图：林彪与叶群）系人、军委办事组和林彪的联系人。叶群不参加军委办事组

办公，江青必参加中央碰头会或政治局会议，而且是这些会议的主角。叶群在文

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豆豆恰恰看错了这个基本点，或者说为了给林彪开脱（其实完全不必开脱什么！），故意编造了林彪和叶群关系假的“基本点”，说他们的关系就是叶群对林彪的控制和欺骗。

关于叶群参加中央工作的缘由，更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那样。这怪不得叶群。叶群参加中央碰头会、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进政治局等等，现在看来“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另一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必然性），并不是叶群有“野心”就能当得上的。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去分析研究，不能因为林彪、叶群是“坏人”，就讨论叶群这样的“坏人”应不应该有如此政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不但党和国家的命运由毛泽东决定，就是每个高级干部的荣辱褒贬，也在毛泽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掌控之中。

其实，军委办事组（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稳定军队、加强战备、苦撑危局、支持总理工作、反对江青一伙等等重大问题上是有正面作用的，叶群在林彪和办事组之间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比如，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从黄、吴在中央碰头会时期，到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时期，他们对江青是知表不知里的，对江青的底细是不清楚的。虽然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不满，也是不敢太过分的。但叶群对中央文革不满，对江青一伙不满，林彪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不满，叶群是坦现在黄、吴、李、邱面前的，这样势必使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斗争有了底气。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态度，叶群当然会及时告诉林彪。应该说军委办事组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一伙的斗争，黄、吴、李、邱是有功的，叶群也是有功的。

再比如，叶群知道更高一层的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对重大事情的态度，把信息传给黄、吴、李、邱，不但对军队工作本身是支持和帮助，就是对黄、吴、李、邱在文革复杂混乱的局面中把握好一些问题的界限和分寸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这点上，黄、吴、李、邱也是感激叶群的。

林彪和叶群的关系，绝不是林豆豆说的“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的关系。

叶群有时为了林彪的身体，不得不推却或私下处理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所谓善意的“欺骗”。但绝不是路线问题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对林彪欺骗，更不是为了毛泽东所愿而欺骗林彪。林豆豆说叶群对林彪欺骗和封锁等等，只是林豆豆十分幼稚的为了“维护”林彪找托词而已。

林彪曾在毛家湾当面骂过江青，掀了茶几。这正说明叶群没有对林彪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问题上误导林彪。这个例子，说明叶群对林彪不是欺骗和控制关系，叶群从没有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思想来影响林彪。

林彪更不是动辄骂人的人。陶铸危难时，林彪也只能说“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才是林彪式的语言，既含蓄又明白。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号称第四号人物。陶铸和林私交很好，但陶铸的命运完全抓在毛手上，江青、陈伯达又不肯松手。在这种局面下，林彪不可能保陶铸，只能用“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样看似含混实则明确不过的“林彪式语言”来告诫陶铸。毛泽东最后还是抛弃了陶铸，抛弃陶铸时还拿陈伯达来打掩护。

林彪和陈再道既不是一个“山头”的，平时也没有个人情谊和私交。因此，林彪怎么可能在“七二〇”事件上破口大骂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呢？更不可能对陈再道有明确的支持和张扬的表现。《林豆豆口述》31页写到：“林彪气得发抖，说：‘……说陈再道想害主席，胡说八道！’”“林彪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煽动群众……主席为什么不离开武汉，他多次说大家不要怕接触群众，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接触一下群众？他出来接见一下群众，就不会出这场事了嘛！’”同一页林豆豆还写到，林彪因毛泽东在武汉有男女关系问题大骂毛，“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不能跟着他去丢丑。”这段话，显然是用现在林豆豆的观点代替当时林彪的观点。文中还有不少错误。其一，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林彪应该知道；其二，毛泽东并不是怕死不敢见群众的人，中央（当然包括林彪）劝毛离开武汉是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其三，“七二〇”事件并不是因为毛泽东迷恋女人引起的；其四，林彪是不会支持陈再道的；其五，林彪是绝不会谩骂毛泽东的；等等。林豆豆在此与其说出了毛泽东的丑，不如说大大伤害了林彪。林彪是慎言的人，连邓小平都说过：“林彪不爱说话，我认为都是他的优点”。因此，我们说林豆豆笔下的林彪是不真实的。

平心而论，叶群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联系斡旋，与周恩来的联系沟通，与黄、吴、李、邱的联系沟通，做了很多努力；为了适当、适度让林彪掌握情况，适当地出席会议和公众场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就是叶群在文革中的主要工作。因此，叶群的态度和走向，上对林彪、周恩来，下对军委办事组，都至关重要，是应当肯定的。

不管叶群思想水平怎么样（中共最高层的夫人里，她应是上乘的），工作能力如何，她在文革中做的具体工作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小。例如：

1. 八届十一中全会，她是坚决反对林彪回来参加会议的。叶群1970年讲过此事。她原话大意是“回来干什么？回来就得表态，这个态不好表……”

2. 文革初期她是极力保护军队老干部的，像保吴法宪、李作鹏、李天佑、王秉璋、赵尔陆等等，还冒着危险抢救过几乎被造反派揪斗至死的邱会作。虽然这是林彪的决定，但是叶群不认真执行，这些老干部也是要吃苦头的。

3. 在1967年，在军内是反党委、反党委领导，还是保党委、保党委领导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拥护党委、拥护党委领导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上，在稳定军队还是搅乱军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叶群立场坚定，在“五一三”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对稳定军队是有功的。

4. 叶群在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方面，也是有功的。

5. 反对中央文革，和黄永胜、吴法宪责骂江青，惹出李必达事件。李必达事件反映了叶群对中央文革和江青的真实态度，有林彪的一点影响，但基本思想是叶群本人的，这也是不简单的。

6. 看了《邱会作回忆录》，知道周恩来总理和叶群在1970年极力支持邱会作儿子邱路光和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也是一种对文革的叛逆思想。张霖之毕竟是毛泽东、江青都点过名，称其为“走资派在座就有”的人。

总之，叶群在文革中，对稳定军队，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等方面，是有功的。这是历史事实。

就林彪和叶群个人关系来说，纯属家庭私事。但林豆豆硬是杜撰“叶群对林彪是控制和欺骗的关系”，本文不能不说几句。

在夫妻关系问题上，林彪对叶群是很有歉疚的。文革前林家是最清静的。林彪从不交友，生活单调，身体不好不出门，生活上对叶群依赖很大。叶群是很愿意参加工作的。解放初，她曾在教育部普教司任副司长，林彪的具体生活由工作人员照顾。有几次，工作人员给林彪冲藕粉冲不好，林彪吃不下，影响了身体。周恩来亲自给叶群说，照顾林彪同志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工作。这样，叶群不得不脱离地方工作岗位，专职在家照顾林彪。多年后，叶群半开玩笑地说：给101冲藕粉，就是为党工作。所以，叶群平时也难得出门。文革中叶群有机会到战友、部下家看望，见到别人家里的“生活气息”很浓，非常新鲜，非常感慨。林彪从来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请客人吃饭。文革前有一次陈毅来访，谈完事，开朗、豁达的陈老总说：今天就在你家吃饭喽。林彪却说，和我吃饭那有什么油水呀，饭没有吃成。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林彪曾给叶群写下“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的条幅。这是林彪1970年5月1日题给叶群的，落款为“书赠战友叶群 林彪”。这说明至少在1970年5月以前，林彪和叶群政治上是一致的，是感情至深的。林彪不是一个会作秀的人，没有感情，不会对叶群写出这么真挚的话语。1970年5月以后呢？这离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在蒙古温都尔汗“死同穴”仅为一年。这一年，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日益紧张的一年，叶群和林彪应当是风雨同舟的。（右图：林彪给叶群写的条幅）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谈话，造成黄、吴去主席处告状，邱去周恩来处汇报，林彪、黄、吴、李、邱对江青的不满摆到了毛泽东面前。之后，有吴法宪在宪法问题上跟张春桥的争论，有庐山会议毛林交恶公开化，有毛泽东“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叶、李、邱下政治结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直至毛泽东南巡等等，不必多说。这样从时间上排排队，说明叶群并没有在哪个时间段和林彪根本上不一致，形成对林彪的“欺骗和控制

的关系”。所以林豆豆杜撰的林、叶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林豆豆旨在为林彪辩诬，想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

总体来说，林彪、叶群的确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九一三”事件，叶群死于非命才52岁。

四、无知不是理由——林彪不需要林豆豆式的护短

林豆豆为了给林彪护短，搞出个耸人听闻的“打针、吃药”说。《林豆豆口述》19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为什么在他不知道和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我曾质问过叶群，叶群倒在自己的卧室里吞声抽泣说：‘上边的人’决定的，知道的，是通过组织的……不给他用这些药，按他自己的思想和气质讲话，行事，他马上就要同主席对立起来……”。92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次上天安门参加所谓‘检阅’和集会讲话时，由于事前30分钟之内被强行注射了据说是外国最新的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的剧毒药物”。148页写到：“林彪在他不知道用什么药或他极力拒绝的情况下，总是被强行注射了最新进口的剧毒药品。这些药片连林彪的保健大夫也不清楚，我多次问他们，他们也不敢说……”“林彪被注射药品后，令人奇怪地突然‘精神’起来，与用之前，从精神状态到言语，判若两人”。林豆豆还写到，给林彪打剧毒药品，叶群明知道也无可奈何，“流着泪说：‘上边的人’决定的”。

林彪的上面还有谁？非毛泽东莫属。林豆豆给出的答案告诉人们，是毛泽东逼迫林彪打进口剧毒药品，打了针就“与用之前，从精神状态到言语，判若两人”，“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这样林彪就讲了错话，办了错事。

这是林豆豆式的护短，可是林豆豆又不会护短。林彪不需要这样幼稚的护短，遮住了这头又亮出了那头。

众所周知，不要说林彪这样领袖一级的人物，不要说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就是一般的群众，看病都有医生签名的病历和签名开出的处方。文革期间毛家湾的

保健医生有蒋葆生、王子敬两位，他们都否认这个天方夜谭。林彪的治疗都有严格的规定，严格的记录，都是专人负责，专人领取，这是有据可查的。据切实了解，发到林办的林彪用药，都是封有火漆印、有专人签收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林豆豆说，“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那么试问：充满哲理的“林彪式”语言，也是打针后的胡说八道吗？林彪对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斗争，甚至当着江青掀茶几，叫江青滚，也是打针后精神失态所为吗？林彪文革初期指示军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评说：不介入是假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反对解放军机关造反夺权，要求稳定军队，要求加强战备等等，林彪指示黄、吴、李、邱支持周总理工作，也是打针后的呓语吗？《林豆豆口述》的出版，搅得是非颠倒！



（上图：1966年9月5日，周恩来看林彪修改发言稿）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嘶哑的声音在广场上飘荡，带着阵阵寒意。以往重大的讲稿都是事先拟好的，但这次非常不同。当毛主席来到城楼大殿，我看到林彪马上把讲稿拿出来请他审阅。无疑，这次林彪的讲话毛主席十分重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并让林彪对其多处修改。林彪坐在毛主席旁边指着讲稿向他解释，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对讲稿进行修改，周总理也在一旁帮着他字斟句酌。林彪改罢稿子，又指着改好的地方，请毛主席再次过目。这一系

资深摄影师孟昭瑞

所著的《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记述了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情景：“检阅开始，就听见林彪在喇叭里对广场大声嚷嚷着：‘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

列动作，都被我用照片定格下来。”。

孟昭瑞的著述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例证。文化大革命都被彻底否定了，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孰能无错？林彪在文化革命中，至少在文革初期不能说是没有错误的，应该进行事实求是的研究、论证，并要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来相比较来分析。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角度看来，官方认为毛泽东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总理说过了违心的话，办了违心的事，不参与具体工作的林彪却被说成犯了罪。这显然是非历史的，是政治说教。（上图：1966年9月5日，林彪请毛泽东看发言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那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邓，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面前不攻自溃，表示“永不翻案”，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是一般群众，他们应是坚贞不屈、英勇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在应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面前，在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巨大浩劫面前，没有进行抵制斗争。

在《林豆豆口述》118页中写到，“当林彪听到贺龙同志病逝时，不禁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都不开了？！’”也是毫无必要地向某些人递送秋波。

有些事情我们还记忆犹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周恩来在4月14日大会发言时着实对林彪夸奖了一番，此后林彪即席讲话。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切胜利和功劳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林彪特意提到贺龙，说，“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

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说此话时林彪伤心地呜咽起来。林彪这个发言是4月14日，而贺龙是6月9日去世的。怎么仅一个多月，林彪就判若两人，为贺龙鸣起不平来了？林豆豆哪是为林彪翻案，而是告诉人们，林彪是个两面派。

贺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完全应该平反！在文化革命中，贺龙被打倒的责任主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林彪有责任也是个配角而已。林豆豆完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文过饰非。不过，从当时毛泽东和刘、邓斗争的情势来看，贺龙和刘、邓，和彭、陆、罗、杨打得火热；在批刘时，贺龙自己都说“上纲上不去”。贺龙的问题在深化，毛泽东表示不保了，关键在于所谓“通敌问题”。关于所谓贺龙通敌问题的信，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专案组，并交代要认真看。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有记述：“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

1974年9月29日，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对在文革中给贺龙立专案问题做出如下解释：“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1974年林彪早死了，而毛泽东、周恩来都还健在。如果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搞的，与毛泽东、周恩来无关，上面的解释就毫无意义了。其实，在贺龙的问题上，贺龙的家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不拟提及。

《林豆豆口述》145—146页中说，“1962年到1966年，林彪多次对全家人说：‘彭真关于吸取党的历史教训，胸怀旷达，不念前嫌，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你们都要把彭真同志、杨尚昆同志当作学习榜样。’并多次给我和叶群、林立果题词：‘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还叫我把题词压在玻璃板下经常看。”直到杨、彭先后被打倒，林彪竟然还说：“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坚持不让林豆豆拿掉题词。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生前解放了很多老干部，但不包括彭真。彭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老干部都解放后，最后一个解放的，可见中央对彭真的解放很久才达成共识。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批评了彭真的错误，此前，彭真已被免去东北局书记一职，降为副书记，后又调往华北。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聂荣臻元帅第一个揭发彭真在华北的错误，聂帅说（大意）：有些错误是彭真搞的，他栽到我头上，我都准备带到棺材里去了，毛主席英明伟大，揪出了彭、陆、罗、杨……。

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彭真说：“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藉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也严厉地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在1966年6月下旬的一

次重要会议上说：“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书记。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难以相信与彭真没有私人往来、对彭真“党内搞党、党内搞派”“也有感觉”的林彪，突然会对家人提出“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而且“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而在于林豆豆为什么此时要把这样的话拿出来？是乞求！林豆豆写这封信是1980年3月，此前即1979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东山再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接下来就主持公审。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下课，所谓毛派势力一扫而光。林豆豆此时想告诉公审的主将彭真：我爸爸林彪还说过你好话呢！试问林豆豆是不是也被打了毒针改变了思维？这是给父亲身上抹黑，还是为父亲脸上添彩？

《林豆豆口述》117页到118页，还提到汪东兴九大前生病一事。这是1969年春天的事，林豆豆误记为“约1969年秋”。林豆豆绘声绘色地写到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峨“对叶群和我放声痛哭说：汪的病，就是为‘他们一家’活活累的……汪这次突然大出血，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说要是你们救了他的命，‘人家’将来就会要你们的命。所以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和总理，怕你们和总理担风险。”

林豆豆身临其境，没有任何人能否认。但如果汪东兴家人说林豆豆造谣，林

豆豆也不能证明她不是造谣。而以下情况也是确实的：此时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峨还不认识叶群，叶群的到来使姚湘峨很感激。姚湘峨是“很识时务”的老干部，面对着非常拥护毛泽东的林彪夫人，不知其内心态度，就对伟大领袖大发一肚子怨气（“人家”就是指毛泽东、江青），姚湘峨不怕掉脑袋吗？叶群对姚明显露骨



的挑拨言语，敢“一拍即合”吗？另外，汪东兴的医疗关系和组织系统与军队毫无关系，汪东兴怎么会说“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如果北京医院有医疗问题，报告周总理是可以的，找叶群有何用？

（左起：李作鹏、邱会作、邱会作夫人胡敏、叶群、吴法宪夫人陈绥圻、黄永胜）何况当时北京医院的医疗水平高于解放军总医院（301），且北京医院就掌握在汪东兴手上，何人敢怠慢？所以，林豆豆所讲真实性值得怀疑。

汪东兴九大前确实生病了。但叶群看汪东兴的用意，林豆豆没有搞清。九大以前，叶群就参加了军委办事组，对军队的事已经涉入较深，了解较多，但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还了解不深。汪东兴则相反，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知道较多，对军队的事基本不了解。过去叶群和汪并无私交，这次汪病了叶去看望，正是互相接近的机会。汪生病，毛主席不可能亲自去看望；叫江青去，江青摆架子不肯去，叶群一下子就钻了进来。叶群去看汪，黄永胜、吴法宪也去看了汪，后来黄、吴、叶、李、邱又一起去看了汪。这些军中大佬生性豪放，热情洋溢，汪东兴受宠若惊，竟有些忘乎所以，他为了讨好叶群竟脱口说了一句：“是不是有些卸磨杀驴呀？”汪说后马上自觉不妥，又有意收回说：“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主席竟让我参加碰头会，真是对我的信任。我工作做得不多，还病了。”叶群很聪明地说：“你这么想就对了！”叶胜了汪一筹。

这就是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走得很近的开始。汪东兴不是拿骂毛泽

东为代价靠近黄、吴、叶、李、邱的，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汪东兴的心态。从此叶群、黄、吴、李、邱为汪东兴办了很多事，如汪的子女当兵等等，对汪东兴是有求必应。汪东兴为了讨好黄、吴、叶、李、邱，在汪东兴家，在三座门（军委办公所在地），就讲了不少毛泽东的家事，虽然多是骂江青的，但也涉及不少毛泽东个人的隐私，有些活动林豆豆、林立果和黄、吴、李、邱的子女也在场。看到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交往的情况，就很容易解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坚决拥护林彪讲话，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耍“揪人”的表现，以及叶群为什么在林彪8月26号去毛泽东处开会时叫林极力保汪（甚至摔了一跤）。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汪东兴是信任的。九大推迟开，主要是因为汪病了，毛泽东说：“汪病了，要等汪好了再开。”九届二中全会汪跳得最高，毛主席还是保了他。就汪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忠臣，而是脚踩两只船。当汪东兴知道毛泽东真正不想要林了，他又回到毛泽东这边，轻巧地检讨把责任推给陈伯达，毛泽东就让他过关了。从此，他与叶群再也没有私人来往。1971年关于毛泽东要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事，汪东兴没有为叶群透一点信，叶群一检讨就被毛主席劈头盖脑地批了一顿。毛泽东去世后，尸骨未寒，汪东兴又去主谋参与抓“四人帮”，不知毛泽东在九泉之下怎么想？他老人家号称洞察一切，却没有看清汪东兴的内心。粉碎“四人帮”后，黄、吴、李、邱最为高兴，其政治生命本应有所转机，但汪东兴却极力主张把黄、吴、李、邱押送秦城，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林豆豆口述》中，也多次提到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及林彪对此的痛恨态度，甚至家里的保姆王淑媛（?!）也知道毛泽东的男女关系并对毛大发微词。林豆豆自以为爆料新奇，把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借着林彪之口发泄出来了。这与其说是对毛泽东的鞭笞，不如说是对林彪的极大伤害。过去污蔑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林豆豆又对自己的父亲污蔑了一遍！应该说林豆豆既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林彪，更不了解毛泽东和林彪真实关系。毛泽东并不是沉迷女色、贪色误国的昏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林彪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英雄”，虽然林彪看到文化革命中的许多问题，看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他对文革的极左路线、对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有意见，感到担忧。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林彪的意见，反而说林彪是反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甚至诬陷林彪抢班夺权，从而紧紧威逼。最后南巡

煽动反林，把林彪逼到在国内无立足之地的地步，直到付出身家性命，造成惨死温都尔汗的结局。毛泽东的确是很对不起林彪的。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能说林彪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毛泽东和林彪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革命历程，革命情谊，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业，足以不朽。林豆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父亲塑造成是反毛泽东的先驱，因为林彪不是！

林彪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但并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错误，更不是打毒针造成的错误。有位了解关心林豆豆的老同志说：“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帅府千金抖出几个“鲜为人知”的“猛料”，就能改变历史的。林豆豆为父亲辩诬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哪些林彪做对了，哪些林彪做错了，哪些林彪要负责，哪些林彪不负责，她并未搞清楚。希望林豆豆努力呀！东隅已失，桑榆非晚。

如果林豆豆是对林彪热爱的、负责的，就应当努力学习，认真思考，潜心研究。比如说在文革中，林彪哪些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的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和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因为本文不是研究、探讨、指证林彪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故不在此展开论述。

有人说林豆豆爱说假话，不是为了造假，而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林豆豆为什么爱说假话，姑且不去探究，但她爱说假话是事实，很多人有同感。林豆豆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必定是局面不可收拾。一个假话说不圆，又编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接下去，编造了一份林家的虚假历史，把林家的群像画得面目全非。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的事谁也帮不了她，只有林豆豆自己来面对。四十年来，时过境迁，林豆豆本身就是一个天涯沦落人，早已是“寻常百姓家”。但强烈的虚荣心使林豆豆一直对社会卖关子，好像她手上有什么高深的东西、重要的史料，能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能解开文革之谜。大家还是丢掉幻想吧，经过努力，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会远远走在林豆豆的前面。

正所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上海文革】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二）

李 逊

党龄最长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

耿金章，上海工人造反派早期重要人物。¹

和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相比，同是共产党员的耿金章是另一种类型。耿金章是山东宁阳人，生于1925年6月，出身很苦，6岁丧父，7岁丧母，和舅舅生活，但舅舅三次将他卖了换钱。他10岁便给地主当长工，后来还要过饭。1946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队，1948年他所在的吴化文部队投向共产党，他也被编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复员到上海纸浆厂当工人。²

比起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岁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算年长者。在后来的“工总司”总部委员中，论党龄，耿金章最长；论年龄也最大，1966年已41岁。他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不识字，半文盲。按一般情况，这样的老党员，在工厂最起码也是工段长或生产组长。但他始终是普通工人，不像王洪文、王秀珍他们是工厂基层干部。除了业余的“民兵连长”外，耿金章没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他1952年在部队时就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党纪处分，1963年3月又因与邻居发生纠纷，殴打邻居，第二次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7年他厂里另一派造反派工人散发关于他的传单，说他“粗暴成性，蛮横无理，稍不顺心，开口就是‘他

1. 耿金章，男，1925-200?年，受教育程度，在“工总司”表格中填写为“无”，又据说是半文盲。文革前是上海纸浆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初是“二兵团”负责人，以后历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

2. 《关于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拘留审查的情况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1967年4月11日。

妈的’，闭口就是‘去他妈的’，骂人不算，在厂里还经常与人打架”。¹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厂工人说他识字，头脑简单，作风野蛮，动不动就打人骂人，“文革前在厂里打人是经常的”。²据说他曾经因同事在黑板报上批评他而打对方耳光。在家里，经常与邻居吵架，甚至打人，有两次打坏了人家的家具，闹到长宁区法院。³

文革开始后，耿金章和十几个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向厂领导提意见。他们一起写了10条意见，内容主要关于领导的工作作风，6月15日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

当天下午，厂党支部书记召开支部大会对我和另一个写大字报的人进行了批评。我当即感到不满，我们又贴了大字报。支部于是组织一些人也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四类党员”，我就更火了。我利用自己是民兵连长的职务，发动民兵贴支部的大字报。⁴

7月，耿金章在厂里组织了战斗队，共30多人，“主要针对厂党支部”。耿金章就这样造反了。

小青工潘国平

潘国平，“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早期重要人物。⁵

潘国平从小生长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2年初中毕业参军，后因膝盖受伤，1964年10月提前复员，被分配进上海玻璃机械厂，当模具木工，因为年纪轻，大家叫他“小木匠”。潘国平兴趣广泛，喜欢画画、唱歌、评弹、话剧，在部队时就得过美术创作二等奖，复员后曾经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的评弹演出。

1. 传单《警惕赫秃式的人物耿金章》，上海纸浆厂造反队1967年3月4日。

2. “关于耿金章的群众座谈会”记录，上海纸浆厂1979年12月1日。

3. 《关于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拘留审查的情况报告》。

4. 耿金章1979年3月6日交待。

5. 潘国平，男，1946—2013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木模工人。“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曾任“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和常委。1968年8月回厂劳动。文革中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1987年又因“投机倒把”被判刑6年。1996年赴美国，2013年因病在上海去世。

进厂不久，他就被借调到厂工会工作，虽然不是干部编制，只是工人编制，但发发戏票，出出黑板报，很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到这是厂党委将自己作为培养对象，很感谢党委，他就每天提早上班打扫办公室。¹文革开始时潘国平20岁，和大学的红卫兵差不多年龄，当工人才一年多。

潘国平文革后回忆自己最初的造反经历时说，他当初应该算是“保守派”，因为他最初的“造反”行为，其实是“保”自己所在工厂的党委干部。文革前夕，正值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他所在工厂的干部被一网打尽：厂党委书记被说成“贪大求洋”，一个厂长是“叛徒”，另一个厂长是“变节分子”；下面的车间或科室干部，不是“招降纳叛”，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实在找不出什么，就被说是“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潘国平觉得工作队对干部打击面太大，于是，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六月上旬，他也给驻厂“四清”工作队贴了张大字报：《工作队包庇牛鬼蛇神过关》²。

潘的大字报遭到工作组反击。第二天，针对潘国平的大字报便在工作队的组织下，一下子贴满厂区。工作队说他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说“潘国平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就是指向党的领导”。还将潘母亲的个人生活隐私也抛出。8月下旬，厂里工人在党委支持下成立红卫兵，潘国平没资格参加，组织者说他父亲尽管当前职业是工人，但因为“解放前开过戏院”，所以不是纯粹的工人。潘原来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厂党委支持他报考；工作队来后，却说他“不安心工作”，想当演员是“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给他出具报考必须的所在单位介绍信。³潘国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

1965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1966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 李逊 2006 年在美国时对潘国平的电话访谈。

2. 同上。

3. 上海文化大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 1967 年 6 月编《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¹

潘国平几次去市委告状，都没有什么结果。而这个时候——

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²

潘国平去市委告状时，正是北京红卫兵刚来上海串连之际，在市委门口，潘国平认识了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文革信息。8月28日，潘国平将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听来的揭发市委“不要抄家”等“十条”内情的信息，写成大字报《揭市委“十条”内幕》，在厂里贴出，当即遭到工作队布置的反击。潘国平向北京红卫兵讲起自己受工作队压制之事，北京红卫兵说：“这种工作队，在我们北京早就赶出去了”。8月29日，应潘国平之邀，北京红卫兵到潘国平厂里参加“大辩论”，被拥护工作队的工人围攻，北京红卫兵差点与他们打起来，但终于不敌人多势众的工厂工人，最后只得撤退。潘国平怕自己被工作队扣留，也打算跟着他们走，但却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北京红卫兵将他拉上

1. 亚衣著：《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载于美国《北京之春》杂志1996年9月第40期。

2. 同上。

他们来时乘坐的一辆卡车，回到他们借住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几天后，正是“9·4事件”，即北京红卫兵冲击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潘国平也参加了。他年轻，加上普通话讲得好，有几次还被上海市民当作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和他辩论。

几天后这些红卫兵要回北京，潘国平表示也想去北京看看，北京红卫兵们答应了。潘国平就这样去了北京。在科技界的一个辩论大会上，潘国平见到出席大会的周恩来总理。他向周总理控告厂里的工作队，周恩来要他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回上海后，厂里一些和他观点相同的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潘国平担任了战斗队的队委。¹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对采访者评论自己的造反原因：

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后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²

从北京回来后，潘国平干脆以膝盖老伤为由，请长病假不去上班，到处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各种文革信息，串连认识了不少人。他能言善辩，在提篮桥一带很出名。有一次被国棉17厂的造反派请去帮忙辩论，就这样认识了王洪文。

1. 以上关于潘国平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2006年在美国时对潘国平的多次电话访谈。

2. 亚衣著：《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

“五好职工”黄金海

黄金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¹

黄金海是苦出身，出世没几天，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长期吸毒，养不活儿子，将黄送给镇江胡姓人家，黄七八岁时，养父病故，养母靠替人洗衣度日。13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养母带他到上海见生父，希望得到一些经济资助。不料生父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强行要回儿子，逼养母回乡。生父送黄金海念了几年小学。15岁时，黄金海当了服装店学徒，被老板当佣人使唤，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饭，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小孩子拉屎拉尿、大孩子上学下学，都包在黄金海身上。稍不如意，老板顺手就是一尺子一巴掌，有一次还把一碗浆糊扣在他头上，将他的头都打破，那个伤疤就此跟随了黄金海一生。

1955年“三反五反”时，黄金海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的生意不久停了，黄金海自己也因此失业。但他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五反”运动结束，政府在仁德纱厂开会，给各厂老板发定案书，让黄金海在台上颁发手工业行业的定案书。几十年后黄金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心里很激动，有种强烈的翻身感，觉得扬眉吐气”。

黄金海在杨浦区失业工人学习班学习了8个月，速成到初中毕业。1953年1月，他进申新5厂，这个工厂后来与另外几个厂合并为国棉31厂。黄金海被分配学车床，培训一年后，他就被评到车工技术4级，厂里留下了他。进厂后，黄金海便打入团报告。他积极工作，每个厂休日义务加班，尽管那时正式工人加班拿双薪，学徒加班没有工资，可参加可不参加，但身为学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积极参加。他技术上进步也很快，三年就被评上5级车工，1957年他车出加工难度很大的特种螺丝，不久评定技术等级，按“应知应会”的技术工标准，他被评为7级车床技工。车床工最高技术8级，他觉得自己升级太快，主动要求减为6级半。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要求减去半级工资，“我应该为国家分挑困难”。他在厂里是个活跃分子，担任了厂俱乐部委员；业余时间他抄写黑板报，领做广播体操，参加歌咏队、舞蹈队、篮球队。他还坚持每周三天读夜校，一下班就啃着馒头去上学；读完了夜校，又上夜中专，

1. 黄金海，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业余中等专科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国棉31厂车床工人。“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学习机械专业，直读到毕业，还打算再读夜大学。他的理想是当机械专业的工人工程师。

但父亲给他带来的阴影却挥之不去。父亲吸毒积习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贪污公款，事发后被判刑5年。而此后，黄金海的入团申请迟迟不被批准，他觉得是受父亲牵连，而他与这个根本不负责的父亲相处仅仅三年不到。他因此有些消沉：“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业余沉溺在钓鱼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胡子，还买了领带和方头皮鞋，去寄卖商店买了格子呢的西装”。¹买西装花了80元人民币，是二手的，还买了件皮夹克。“我比较注意外形，头发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欢显得邋邋遢遢”。黄金海还喜欢跳舞、溜冰，“不过我有底线，跳舞溜冰，我都在厂里，从来不去跳舞厅和溜冰场。那时那种地方都是些当时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黄金海后来这样回忆。文革结束后，有的批判文章说他文革前流里流气，这显然是一种政治丑化。其实，就连他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厂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李剑钰，文革结束后说起黄金海，也说他“文革前表现不错，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²

1964年提倡“学毛主席著作”，黄金海当选为所在生产小组的工会小组长，他重又回归主流价值取向。他对小组同事进行家访、组织政治学习，组织技术交流，“我们小组的工人们那时很融洽，大家学毛选（《毛泽东选集》），休息天互相交流学习笔记，到今天我都觉得是美好记忆”，黄金海50年后这样回忆。³他还进行技术革新，发明车床“双头刀架”，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此外还有多项小改小革。1965年他带的甲班车床组，月月超额生产量都在20%以上，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他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他担任组长的20多人的生产小组，还有两个工人也被评为市“五好工人”。小组成员的合影大照片贴在厂部“光荣榜”上。评“五好”是一场全市性的评比先进活动，在当时声势很大。

文革前夕，1966年4月，黄金海的照片再一次上了厂门口的“光荣榜”。照片被放到12寸大，照片上的他站在自己工作的车床边，自豪地笑着。与荣誉一

1. 黄金海 1977年1月2日，4月5日讲述。

2. 笔者 1992年7月3日对文革中国棉31厂工人李剑钰的访谈。这篇访谈 2009年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杂志 2009年增刊上，发表时的文章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3. 李逊、金大陆、金光耀 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这一节黄金海文革后的回忆，都引自这个访谈。

起来的还有加入共产党。1966年3月，他被吸收入党，支部大会通过；不过，党委还没批下，所以不算正式入党。后来因为文革开始，这次入党也就不作数了。

文革开始后，在党委的号召下，黄金海最初也积极写批判北京“三家村”的大字报——

平心而论，我最初应该是保党委的，因为党委器重我，提拔我。5月党委要大家批判“三家村”，我们根本不认识邓拓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以为邓拓是作家，《燕山夜话》我也没有读过。但党委布置要我们批判，听党的话总没错，我们“五好小组”应该带头。¹

6月，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对“三家村”的批判转向联系本单位实际——

党委要求联系本单位实际，联系什么？厂部情况我又不知道，但我是“五好职工”，应该带头，我就挖空心思写了张给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²

这张大字报是6月25日贴出的，内容是批评党总支一些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间聊天讲大道（沪方言，即“侃大山”），要这些干部下来与工人一起学习。大字报中用“下来”两字，是因为干部们的办公室在车间的二楼。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黄金海正上中班，只见组里工人的车床一个一个关了，他是组长，但却没人因此向他请假或打招呼，他心里奇怪，也不好问。后来方知是车间党总支叫他们去开会，但却没有通知黄金海。晚上10点，中班下班，黄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饭，赫然见一路都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到食堂门口，又是一张大字报：“‘下来’就是要党下台！”他这才明白，原来是那张“下来”大字报惹的祸。吃饭时，“本来我们小组像一家人，总是围在一起吃饭，这天大家不敢和我坐在一桌了”。³

1. 1. 李逊、金大陆、金光耀 2009 年对黄金海的访谈。这一节黄金海文革后的回忆，都引自这个访谈。

2. 同上。

3. 同上。

黄金海大字报的内容很平常，甚至可以说批评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党总支却抓住“下来”两字，说“下来”两字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党总支立即布置工人写反击大字报，第二天上百张大字报贴出，说黄金海是“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黄金海父亲的吸毒历史也被挖出，作为黄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贯反动”的有力证据；甚至还有大字报揭发说，黄金海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鸦片馆。黄金海的妻子见到这样声势浩大的围攻，吓得在家里掉泪。

黄金海很生气，认为这是党委抛出本应保密的职工个人档案。因为他在写自己简历时，曾经老老实实在地提到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他去过一次鸦片馆，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这次经历使他看到吸毒的丑陋而更加痛恨吸毒。这个向党交心的自白，现在却被作为罪状抛出。这样的围攻惹火了黄金海——

我是“五好工人”，3月发给我奖状，6月就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了面包去市委告状，毫无下文，我有理有怨到何处去申！¹

有意思的是，当黄金海遭到大字报围攻时，他的那张12寸大照片仍然贴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

8月初，黄金海与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持相同观点工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因为是党总支的批判对象，领不到写大字报的免费笔墨纸张，他们就自己掏钱买。厂里有人指点他们：不要老是纠缠在“下来”的问题上，应该把目标对着厂党委和工作队。此时社会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黄金海觉得有道理。8月30日，战斗队贴出了针对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就这样造反了”，“完全是被逼上梁山”。

10月底，黄金海听说国棉17厂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状回来了，他也想赴京告状，便去国棉17厂串连。王洪文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北京现在很乱，不要去，他们去北京时，中央接待站的人对他们说，厂里压制工人的问题，中央会逐步解决的。黄金海听从了王洪文的劝告，王洪文的热情和稳重举止给黄金海留下

1. 黄金海1977年1月2日、4月5日讲述。

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黄金海看到后激动得掉泪，和王洪文一样，他也觉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针对我们厂的情况说的”。¹

文革结束后，黄金海为自己的造反行为辩护，说自己当初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子？对大字报定名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老实说，工厂工人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的。就连北京有刘少奇的大字报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²

确实，作为普通工人，根本不知上层斗争为何事。他们最初只是相应号召参加运动，以这样的行动表达对执政党的忠诚。

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叶昌明

叶昌明，“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³

叶昌明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将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艰难地带大。1960年初中毕业时，叶昌明因为对无线电感兴趣，就报考了江西省新建的邮电学校。刚去一年，正遇上经济大衰退，学校紧缩，他退学回上海。但此时上海户口紧缩，报不进，他只好将户口“放在口袋里”，成了“袋袋户口”，在里委协助图书馆工作，一年后才将户口报回家里。1963年底，他和另外350名青年一起，被分配进纺织局所属合成纤维研究所，在化验室当学徒工。业余时间，他和同事一起，在研究所自办的夜中专读书。“我们所里绝大部分青年都读夜校的，这是那时的风气”，叶昌明后来回忆说。

叶昌明也认为自己最初并不是造反派，而是紧跟党委的积极分子。他所工作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是上海第一批“四清”单位，叶昌明紧跟党委投入“四

1. 这是黄金海对笔者回忆的。

2. 引自黄金海1978年12月26日的陈述。

3. 叶昌明，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专科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室工人，共青团员。文革中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任“工总司”最初的常委。文革中历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清”运动。因为表现积极，1965年“四清”结束后，他加入了共青团。文革开始时，研究所党委号召写大字报，他就根据研究所党委的布置，贴那些“反动权威”和“有问题”职工的大字报，还在研究所党委的组织下，戴上团支部发的红纸做的红卫兵袖章，坐上卡车去高桥对一个地主出身的职工进行抄家。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市委附近的静安寺一带，到处都是三三两两辩论的人群。化验室翻三班，他下了中夜班，有时就和车间里另一个工人高根才一起，去静安寺一带看大字报。巧得很，这两个当初一起去看大字报的青年工人，后来，各自成为上海两大派组织的领导层骨干：叶昌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常委，高根才成为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常委。

最初，叶昌明很看不惯那些来上海造反的北京红卫兵：

北京红卫兵将上海搞得乱哄哄的，我认为市委怎么可以随便冲击？我也看不惯北京红卫兵趾高气扬的态度，觉得他们随便打人，破坏社会秩序。杨富珍给毛主席写急电，还有其他老工人的大字报，我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很赞成。我那时的观点几乎倾向于保守派。

1

但是，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叶昌明觉得研究所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向，和中央的指向不一致。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社论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所党委却将运动指向那些工程师即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普通群众。

研究所党委和团委隔段时间就抛出一个人要大家批判。有工程师，也有小青工。还公布成绩，说全所批判了多少人，贴出多少张大字报。其实全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写过许多。可对照16条，觉得写资本家的大字报还可以，怎么老是揪群众。²

1. 李逊、金大陆、金光耀 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2. 同上。

使叶昌明真正转变观念的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他在静安寺附近第一次看到传抄的这张毛的大字报。这期间，研究所里有职工失窃，所党委对全所进行了一次抄更衣箱和办公桌抽屉的行动。尽管事出有因，但引起很多职工反感。叶昌明便就此事以及文革的运动方向等，写了张批判研究所党委的大字报：《炮打合纤所的司令部——党委》。此时是1966年的10月，“造反”之火已经在上海蔓延。叶昌明贴党委大字报，虽然在全所引起轰动，但没有受到围攻打击，所里不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公布名单中，他是委员。大字报贴出后，其他车间的工人来找他串连，于是，他们成立了所里第一个造反组织“红旗战斗组”。大家决定集中揭发研究所党委，有人提出从党委对待“红雷青年小组”的态度着手。

“红雷青年小组”，是文革前夕上海市委树立的四大“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除了这个小组，余下的“四大标兵”都是个人：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当时上海报纸连篇宣传“红雷青年小组”，但见报之前，小组所在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职工却不知道自己所里有这样一个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在所里的名称是“6401小组”，是个保密课题的研究组。小组共8名成员，平均年龄25岁。“红雷青年小组”这个名称，是市委决定将其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典型宣传后，见报时所起的名字。叶昌明文革后回忆：

我当时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先进典型，合纤所党委却不宣传，致使所里职工不知道身边有这样一个先进榜样。于是我们写大字报批判党委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毛泽东思想。但是，不久，我们发现，红雷青年小组与所宣传的形象有差距。报纸上文章说，红雷小组成员经常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研究遇到困难时从毛主席著作中找方法和答案。报纸上还刊登了他们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但是，小组成员亲自告诉我们说，没这些事，而且笔记是在树他们为典型后补写的。¹

叶昌明和战斗组的青年认为，“红雷青年小组”的真实事迹并不如报纸上宣

1. 李逊、金大陆、金光耀 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传的那样先进，而是有许多虚假水分，市委树立这样的假典型，其实是为了树自己。战斗组还因此怀疑其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真实性，为此他们特地去杨富珍所在的国棉一厂了解杨富珍的表现。他和战斗组的工人写了大字报，贴到静安公园。叶昌明后来回忆说：“这样就矛头对着市委了”。后来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上，叶昌明的发言正是批判“假标兵红雷青年小组”。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都遭到批判，这些人是执政党为社会尤其是工人树立的楷模，这些楷模隐含着执政党所要求的政治价值取向。他们的优点被放大，缺点被缩小隐蔽，几近完人，甚至有些先进事迹离实际差距很大。楷模与楷模原型的差距，以及被树立为楷模后所受到各种优惠待遇与普通职工的差距，很容易在对榜样最熟悉的周围人中，产生对楷模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以强势推行的教化核心，都是要求人们取消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求超时间和不计报酬的工作，而且要求放弃个人思想。这就有可能使被教化者产生压力和反感。

叶昌明最初一直没有受到压制。但是，后来研究所的团委副书记和别人联名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他出身有问题。这是文革开展以来所里唯一点到叶昌明名字的大字报。叶很恼火，既然说我有问题，我就退出研究所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他将退出声明贴在这张大字报旁边；¹还和战斗组的人一起去市委接待站，反映研究所里的问题，但接待站也没给他明确的回答，他们就又去静安公园看大字报。在那里，他们认识了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

退伍军人陈阿大

陈阿大，“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²

与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等人不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文革前是积极分子、共产党的依靠和培养对象；而且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文革前都已经是党员。陈阿大却认为自己文革前“表现不好”。

陈阿大造反时24岁。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在绍兴乡下长大，11岁时不慎腿骨折，被接到上海与父亲同住。起初，父子俩在沪西复兴西

1. 李逊、金大陆、金光耀 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2. 陈阿大，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锻工，共青团员。文革初期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任“工总司”最初的常委。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工交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6年。

路太平弄，以每月2元的搭铺费租一个床位；一年后搬出另租小屋，房子是竹片和泥巴搭就的简陋棚子，上海人称这样的地区为“棚户区”。搬家后，新的居住地区有文化补习夜校，家人替陈阿大报了名，但他读不进去。他认识了一群比他年龄大的朋友，喜欢上跳舞厅、溜冰场，喜欢评论女人。这样的人当时被主流话语列为“流氓阿飞”或“落后分子”。1958年这帮朋友中许多被送去劳动教养，¹从现在来看，对这些人的处理可能过严，但可以看出陈阿大所交往圈子的层次。陈阿大文革中曾说“自己当兵前也有些流氓无产者作风”。²

1958年8月，陈阿大进中华造船厂当临时工。起初当搬运工，后来当钳工。3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里，陈阿大当过饲养员和炊事员，后来又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后来回忆说：部队生活紧张，军训频繁，纪律严格，与他原来散漫的生活不同；而且原来在厂里每月工资有50多元，当兵津贴只有6元，他就想提前退伍。他还回忆说，为了实现目的，他对部队领导讲自己小时候腿骨折过，至今仍有后遗症。一面写信催母亲将他小时候骨折时拍的X光片子寄来，一面干脆连走路都一拐一拐，经常不出操。部队让他住进师部卫生院，检查下来，骨折早就痊愈。为此领导批评他，说他患的是思想病，没有准许他提前退伍。服满3年的兵役后退伍，他被分配进上海良工阀门厂当锻工。³

以上这段经历，是陈阿大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时在监狱中的交待，不乏为迎合时政对自己矮化。而陈阿大所在部队在陈阿大退伍时，对陈阿大的评价尚不错。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评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⁴陈阿大的军衔也能反映他在部队的表现：入伍一年成为上等兵，退役时已经升为上士军衔。而且，陈阿大退伍进厂不久，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比起其他人，陈阿大的造反原因如今看来有点令人发笑。据文革中一篇材料记载：

1.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交待。
2. 陈阿大在上海市工代会1971年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上海市工代会1971年整风学习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3.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交待。
4. 转引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

陈阿大当初在厂里“杀”出来，不为别的，就因为车间里看不到一张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他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贴了原党总支大字报，以至受到围攻迫害。¹

显然，陈阿大是想做点什么，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据说，陈阿大想造反，可不会写大字报，便悄悄找个同事，要这人将已经写好的一张大字报送给自己，说：“我请你到国际饭店吃一顿，这张大字报算卖给我好吗？”后来，1967年，“工总司”要办《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陈阿大特地请人补写了“良工阀门厂第一张大字报”，签上名，送去展出。²

文革结束后批判造反派，陈阿大是最遭非议的，被作为文革前个人品质差的造反派典型在报纸刊物上批判。在批判他的文章里，他被形容成道德较差并缺乏自我约束力的人。陈阿大工作的良工阀门厂工人揭发说，陈文革前“是厂里有名的穿包裤腿、尖头鞋”的，那时穿这类服饰者被看成“流氓阿飞”。和他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们也看不起他，说他是“草包”，既无文化素养又无工作水平。³不过，如今看来，虽然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举止较粗鲁，缺少规范意识，但如果作为普通工人，文革前的陈阿大至多也只能算有些性格缺陷。

临时工戴立清

戴立清，上海工人造反派领导层骨干。⁴

戴立清祖籍山东，父母迁至镇江定居，后来又上海讨生活，将戴立清留在镇江，先是读私塾，后来又读小学。读四年级时，正逢1949年共产党执政，他来到上海父母身边。父亲原来是铁路管乐队吹小号的乐手，算是铁路警察，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便辞职了，父母都失业在家。1953年，戴立清以14岁冒充16岁，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白天工作，晚上念夜校，读完高小。1955年，戴立

1.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3月22日《简报》第46期。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 《解放日报》1977年10月13日及11月20日所刊文章

3. 文革后有许多文章想当然地把陈阿大写成“满口污言秽语”，不合事实。认识陈阿大的人都说，陈阿大尽管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毫无逻辑，但脏话基本没有，最多就是相当于国骂“他妈的”的沪骂“赤哪”。

4. 戴立清，男，1937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专，文革前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电工。文革中历任“工总司”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清所在街道的里弄委员会改选，他被选为兼职的福利委员。第二年，区里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去外地工作，当时正值大西北建设，要求上海派人支援。里委会讨论可以动员20多人去外地，戴立清负责动员，但实际只有10多人肯去。戴立清觉得他作为里委干部，动员别人报名去大西北，自己也应该带头。他于是也报了名。“我动员别人去，把西北说得样样好，我自己当然应该带头去”，他后来这样说起自己去报名西北的原因。父母坚决不同意他离开上海，因为之前他的两个姐姐已经随工作的工厂迁去了河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是半夜里偷偷走的。

当时说是去支援西北一个建设项目，去半年，建设好了就可以回来。但他们这些上海工人到了那里，不少人没被分去当工人，有的提拔，有的送去培养。戴立清被送去干部学校培训两个月后，留在甘肃省建设局教育科工作，负责职工教育。以后，他还在省建设局做过工会工作，当过文化教员、电影放映员，担任过省建设局机电技工学校的工会主席。中国的工会都是官办工会，主席是党组织选定的，戴立清能当上工会主席，显示他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其间戴立清在兰州一面工作，一面坚持业余学习，自学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函授教育的二进制计算机语言，还在兰州中俄友好协会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了两年俄文，取得当技校老师的资格。甘肃的项目都是苏联援建的，掌握俄语，在技术上和苏联专家沟通容易些。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兰州几个大的苏联援建项目全部陆续下马。戴立清当时正带着学生在其中一个工程工地实习，工程下马，他只好回省里。但省里他原来工作的甘肃省机电安装公司也被撤销，没有工作可安排。1962年父亲病重，他回上海照顾。父亲去世后，他向兰州方面辞职留沪，甘肃原工作单位将他的人事和户口关系转回上海。不过最开始是“袋袋户口”，没有被落实到街道，户口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等待落实户口分配工作期间，他以上门修理家电维修，也帮助里委会和派出所做些事情。一年以后，总算被街道接收户口，而且分配了工作。先是在上海第10钢铁厂当工人，一年后的1964年，上海市劳动局将他安排进上海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来改名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这是个只有一百来人的小厂。戴立清是电工，负责维修全厂的电器部分。不过，不是正式编制，而是临时工。他当教师的妻子暂时没能同时回上海，还在兰州工作。¹

戴立清的这个经历和他的临时工身份，使他造反以后一直被人抓“小辫子”，

1. 李逊、金光耀、金大陆 2007 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说他去了兰州后又回上海，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怕艰苦从内地“倒流回来”。甚至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也认为王洪文不该重用一个临时工。这种因所有制造成的身份歧视，令戴立清很感困惑和委屈，觉得自己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后来因为有困难回来，为何却处处低人一等。

戴立清刚进厂时，受到厂领导的重视。他有技术，晚上还坚持去技术夜校读书以提高自己；他对政治感兴趣，又喜欢看书，在自己的电工房的墙上，贴上“知识就是力量”等标语激励自己。文革前夕，上海工厂普遍开展“四清”运动，当时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开始后“社教”转为文革。工作组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被工作队作为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工作队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工作队在这些会上，向积极分子们抛出他们决定的运动对象的档案：这个人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二鬼子，那个人是一贯道的“三才”，还有谁谁是资本家，布置积极分子们写大字报。戴立清回忆，那时厂里这类大字报大部是他写的，被工作队作为积极分子他觉得很荣光，反正妻子不在上海，他就成天泡在厂里。

但是，8月以后，他的观点变了。使他改变观点的是《十六条》。他仔细阅读了《十六条》后，觉得厂里做法和中央号召不一样。《十六条》说文革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可厂工作队却把普通管理人员当运动对象。戴立清工作的工厂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旁边，华纺是最早安排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的住宿地。戴立清他们经常在工厂附近见到北京红卫兵们，不久相互熟悉。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介绍北京形势，支持他们，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戴立清成立了战斗队，也取名“红旗”，8月25日给厂党支部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工作队和党支部如何抛档案，整群众，如何布置他们写大字报。¹

戴立清文革后说起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总这样认为：“民随王法，草随风动”，老百姓总是上面有什么号召，下面跟着干。一般都这样。我踏上社会已有几十年，从不懂事开始，当过学徒，总的还是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几十年的生活实践，自己有这么个心愿：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从小受了这样的教育，自己也经历了各次政治运

1. 以上资料引自《戴立清罪行揭发材料》，原件为打字油印，无印发单位，但上有“沪委专调（77）183号”字样。估计是文革结束，审查戴立清时整理的材料。还有一部分材料来自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7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动……听党、听政府的话不会错，叫我犯法我没这个胆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总认为思想表现好点，任何单位领导都会对自己有好的看法。平时自己也想积极点。文革中我态度是听党的。¹

戴立清显然希望以自己积极投入运动的行动，表现自己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忠诚。这应该是许多人当时共同的真实思想。

戴立清又动员厂里一个女工贴出大字报《我的控诉》，说厂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一定要和她谈恋爱，一下轰动全厂。戴立清他们就对厂里提出，这种人怎么能担任党支部领导，应该下去劳动，工厂领导也就真于8月23日作出决定，让这个书记下去劳动了。事情汇报到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局里认为这是“政变”，几个非党员工竟然把厂党支部书记赶下台。于是布置反击，甚至还打算抄戴立清的家，人都集合准备上车了，因为有人不同意作罢。这是9月上旬的事。面对上级党委组织的反击，戴立清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压力很大，也想到会不会失业，但又想到反正凭技术吃饭。我最担心的，还是政治上会被划为另类。²

戴立清于是去机电一局和市委接待站告状，没有什么结果。9月底，戴立清和另一名造反派工人、“红旗战斗队”队长房有柱，自己买了车票，背上被子，去北京告状。在北京，他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更认定自己没错。戴立清将厂里情况写成文字，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请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吕英豪和徐险峰，转给他们学校的造反组织“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请韩转交中央文革。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戴立清他们也参加了，见到了毛泽东。

1. 戴立清 1982年4月28日交待。

2. 李逊、金光耀、金大陆 2007年9月对戴立清的访谈。

【评论】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二）

黄金海

九、关于张春桥和“工总司”谈判签字的第一个“五条”

1. 叶说：在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张春桥到了安亭，在飞机上“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在仪表机械厂同王洪文等谈判时，一方面说张春桥“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张肚里“主意”，不知叶永烈怎么知道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在谈判中张竭力动员人家回上海解决问题，这是中央文革交给他的主要任务，陈伯达的最后陈述中也证实此事。而且张到上海电（报？话？）请示陈，是先去市委还是先去现场安亭，陈明确指示直接去安亭，并非张自作主张。谈判中潘国平和红卫兵们坚决不同意就这么回上海，叶永烈说：“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兴亡》第446—449页）。

试问：既然张早就肚里有主意凭借“工总司”之力扳倒陈、曹和上海市委，取而代之，应该高兴，不肯回去才对。事情闹大不是更好嫁祸陈、曹，为什么“着急”呢？

2. 将签“五条”提前了足足三十多小时。

叶永烈说，在谈判中“王洪文向张提出了五个问题”（《兴亡》第448页）。一是：工总司是不是革命合法组织；二是：我们北上控告是不是合法行动；三是：安亭事件由谁在负责；四是：能不能答应我们要求，曹做公开检查；五是：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方便。（基本上就是后来十三日在文化广场签的“五条”内

容)。又说：“张春桥很痛快地答应了”。这是在十三日下午，去文化广场谈判后签的内容，怎么提前到十一日夜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当时张春桥就可以签字，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事了。

事实是：十一日夜张到安亭谈判，除了竭力说服动员大家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外，根本没有任何承诺。可能谈判中王洪文或其他一些人提出类似要求，在当时来说也是大家迫切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但张根本没表态（因我不知张来安亭，没参加）。谈的气氛很对立，没达成任何协议。这一点，当时在谈判现场的《解放军报》记者甄文君当天（1966年11月12日）致周总理的电话记录可以证实。（《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41页）

到十二日晨，张亲自到煤场同群众见面时，叶说：“张春桥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该由上海市委来负……。’”（《兴亡》第449页）

这完全按叶的“张要取而代之”思路胡编的！当时我就在旁边，张春桥一开始讲话仅仅说：“我这次来，主要受中央文革委托动员大家回去。有什么问题大家回市里解决”，还讲了许多大道理，并没有对实际问题表态。以致当场就有许多学生红卫兵和工人群众骂张春桥是“大骗子”，就是来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等……，并责令张春桥把伞拿掉，和大家一起淋雨！接下来，情绪激愤的群众自发地爬上引擎盖，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们响应中央号召，贴领导大字报，如何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批斗，关押……场面非常壮观。控诉足足延续了六七个小时。如果在几小时前张春桥就痛快地同意王洪文提出的“五点”，他怎么会遭到群众一顿痛骂呢？最后张春桥也只表示：我对上海情况不很了解，听了大家的揭发，触动很深。这次中央文革小组派我来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北京。对大家受压制表示同情。落脚点还是动员大家先回去。

3. 叶永烈说：“张春桥说今天你们撤回上海，明天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兴亡》第448页）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事实是：12日下午张虽遭了骂，但站在露天煤场上，又下着雨，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既然答应“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北京去”，看来大家只好回去再说了，多数也发生动摇，同意回去。王洪文将他十七棉的一百多人拉回厂去了，许多人骂他是“叛徒”、“软骨头”。当时我对张春桥提出：回去可以，但不能直接回厂。

我们在文化广场集中，你来解决问题后再回厂。因为许多厂出来仅几个人，回去肯定遭到迫害。张春桥当场答应了。车子一开走，总部的人又一个也找不到，是我将这一千多人直接带回文化广场。

这个在“文化广场集中”的主意，完全是十二日下午我临时提出来的，没有和王洪文、潘国平以及任何一个总部的人商量过。张春桥怎么会在安亭谈判时就说“明天我在文化广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仍有五百多人不相信张春桥，认为他是骗大家回去，坚持要步行上北京。这便冒出以耿金章为首的几百个人，坚持步行北上，即后来形成的一个“北上返沪二兵团”。这又证明，张春桥在安亭不可能答应王洪文提出的“五点”（《兴亡》第448页）。

4. 关于五百多人步行北上，叶永烈像写惊险小说似地说：“张春桥十二日下午四时回上海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叫他‘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拦在昆山，劝回上海。’”（《兴亡》第450页）可惜，叶的科幻脑子里，缺了个重要的“科”字！

首先，12日下午四点，安亭煤场接见刚刚结束，王洪文等人不可能回到十七厂，无法打电话。

其次，那五百多人还未从安亭出发，怎么会到了昆山？张春桥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走到昆山？当时“五条”尚未签，怎么就叫王去劝回？

再次，这五百多人不听劝阻。我不认识这些人，不放心，就派我厂的陈琳（女）负责（其中我们厂里就80多人）。走到昆山后，在昆山中学里，冒出一个耿金章。凭借他是党员，指使几个人将陈琳搞下去，耿金章成为头头，即之后的“二兵团”司令。

复次，对工总司的“五条”正式签字，叶书的情节是编造的，说“十三日王洪文拨通了张春桥电话……问张春桥原定下午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见面，是否如期进行。张春桥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照常进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五项要求。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兴亡》第451页）

第一，当时王洪文根本不可能知道张春桥的电话。

第二，一千多人等在文化广场，是我在安亭临时向张提出，张同意了。当时王洪文带了厂里的人已经走了，王根本不知道文化广场的事，王怎么可能电话问

张“原定文化广场见面”的事？

第三，说张春桥13日下午在文化广场接见，“消息从工总司传出，造反派互相通知”。如果真有此事，13日下午文化广场必然要涌进几万人，可是文化广场自始至终就是从安亭回来的那一千多人。

叶永烈说：“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兴亡》第452页）这是不对的！首先，叶对文化广场的地理位置都没搞清：陕西南路是南北向，文化广场八号门是东西向。张从两条相交路之间的八号门进来，站在文化广场根本看不到陕西南路（文化广场有八个门，当时为安全起见，组织了复员军人纠察队，除永嘉路八号门外其余都关闭了）。王洪文要“久等”，必然是站在八号门口，怎么会看得见陕西南路上“张春桥的轿车”？其次，那天一早我就派人四处找王洪文。潘国平估计张春桥可能来谈判。到下午二点半，张春桥和秘书何秀文以及徐景贤从八号门进来了。王洪文、潘国平两人都还没有找到。

事实是：12日傍晚，我将一千多人造反派用市委派来的公共汽车带到文化广场，当时总部一个人也看不见，就我一个人。我叫复员军人上台，组织一支“纠察”队，控制好八个入口大门；又叫共青团员上来，到市委接待站去搞点吃的，因为大家几顿没吃了，又下雨；另外派人到巨鹿路总部去找王洪文、潘国平来。

一直到13日下午2点半左右，张春桥、何秀文和徐景贤三人从八号门进来。我很着急：王、潘都没找到。我只好安排三人在后台西面第一间小休息室休息一下，这时交大及首都的几个红卫兵也挤进来，泼头盖脸地骂张是来镇压工人运动的，把大家骗回来，开口就是“他妈的”。我看不惯，因为张毕竟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而且警卫员都没带就来了，这样骂不像话，就请他们出去了。这也证实，叶所说的张在安亭就一口答应王洪文五点要求是生造出来的！

直到3点多，潘国平和一批红卫兵来了，可仍未见王洪文。我就将他们安排在后台西端一个大化妆室进行谈判。争争吵吵，弄来弄去，争议了两个多小时才拟定“五项要求”，张春桥签了字。出来时，我要求张春桥到台前同台下一千多人讲几句话。群众得知张春桥同意了“五项要求”，一片欢腾。大家高呼口号后，就散去回厂了。简单事实经过就是这样。

虽然最后签字的“五条”基本内容与在安亭谈判时大家提的差不多，但叶将

它提前到12日，性质就变了。13日争议了两个多小时的“五条”，变成12日张春桥就“爽快地答应了”；也变成张早就设计好了，“借助‘工总司’力量干掉陈丕显、曹荻秋，取而代之”。叶的用心可谓良苦！

十、关于被困在南京的一部分造反派

叶说：“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都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为什么不叫王洪文去哩？王洪文太无能了，张春桥也看不中他。”（《兴亡》第457页）这又是瞎编。

1. 苏州这五百多人，是我从苏州把他们带回来的。上海“五条”签字后，原来讲好，我及时赶去通知他们回来。在接近苏州处碰到队伍，方知负责带队的已换成耿金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耿不让我讲，说动摇军心，到了苏州就将我困进一家浴室里。第二天，11月15日，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来苏州，同耿签了第二个“五条”后，是我将这五百多人带回上海的。在红都大戏院集中后，耿不肯散，要大家留个通讯录。我知道耿有野心，就将我自己厂里的八十多人全部领回去。此后，果然耿在这四百多人基础上拉出一个“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周宝林是其中一人，当时我根本就不认识周。无论在苏州或后来改称“二兵团”，周从来没有担任过一把手。即使耿金章将这部分人组成“北上返沪二兵团”，周也没有担过什么职务，张春桥怎么可能知道此人？

2. 南京这部分（后来也叫“北上返沪一兵团”）的负责人是戴祖祥。我曾直接找戴核对过，根本就不知道周宝林这个人。当时他们也不在南京，兵团火车被截困后，就步行北上。到六合后，是潘国平把他们领回来的，与周宝林根本没关系。叶对此绘声绘色，描写了一大段，如何“许家屯接见”，又是如何将戴祖祥队伍接回来，又是王洪文“吃醋”，如何排挤周等等。叶是在显示他的文学才华吧？（《兴亡》第457页）

3. 在写“安亭事件”时叶永烈还说，“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这里又说“王洪文太无能了，张春桥也看不中他”，真是自相矛盾。

在南京这部分人乘火车回上海，叶永烈说：“王秀珍也坐火车上，只是尚未

崭露头角。”可在写“安亭事件”时，说王秀珍冲在前头，将两个孩子托在邻居家了，还和王洪文、黄金海“三点一线”结成忠实造反战友。叶永烈胡编的情节无法自圆其说，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

十一、关于苏州的五百多人动员回来的情况

叶永烈说：张春桥给在苏州的王洪文打电话，“王洪文紧张。张说我和你一起去，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兴亡》第454页）。这是把想象当成了事实。王洪文根本就没有去苏州，何来张春桥和王洪文打电话？苏州这五百多人（叶在书中说一千多人），同耿金章又签了第二个“五条”，当时张、曹、魏都签了字。到第二天在苏州铁中开大会时，我才知道此事。王洪文根本没有来。会上我向张春桥提出，前面已经有“五条”，为什么还要再签另一个“五条”？而且都以“工总司”名义？我认为这些人根本代表不了总部。张说：反正内容差不多，现在重要的是先把大家动员回上海。会后，是我将这支队伍用大巴带到红都大戏院集中后散掉的。当时耿坚持要大家留下通讯录，我们厂八十多人没听他的，和我一起回来了（此后，耿就在这四百多人的基础上拉出一个“二兵团”）。当时没有王洪文。可叶说“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在谈第二个“五条”时，“王洪文在一侧不由得一惊……”（《兴亡》第455页）这是无中生有，叶先生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去苏州签第二个“五条”时，叶描述：“‘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曹荻秋签完字后说，我保留意见，韩（其实应该是魏文伯）也表示‘保留意见’。”（《兴亡》第456页）。

实际情况是，首先，签字时间是11月15日，在前一天王力就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王一平接的），告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和支持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安亭事件的“五条”），曹不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曹讲这种话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即使曹思想上有保留，决不敢也没必要公开对抗中央决

定，引火烧身。事后曹在策划成立“赤卫队”时对“赤卫队”头头讲：“我后来在苏州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这才是曹的真实思想。而叶完全是出于想象，是一种政治献媚！

事实上，在苏州铁中大会上张、曹、魏都讲了话，毫无“保留”之意，而且都做了自我批评，对大家表示道歉。我在现场亲耳所闻。

十二、关于“上海工人赤卫队”

叶在讲“赤卫队的崛起”时披露：从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都得到上海市委曹荻秋的支持。几次重要的会曹都亲自参加，并表示坚决支持。还派总工会张祺、市委的杨士法等人赤卫队联系，在市总？会大楼为他们提供办公地方。但是叶却是用一个“告密者”的口吻写的，告密者是谁未作交代。

叶永烈说，王洪文接到告密者的情报，“七窍生烟，魂不守舍”，便在司令部召集常委会，商量怎么对付赤卫队，还说“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住脚跟”。（《兴亡》第463页）

告密的内容部分属实，这从当时赤卫队自己的揭发以及曹的检查材料中都可以证实。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曹同赤卫队签字没经市委讨论，市委不同意，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发文件。”这时，曹已知道政治局常委和毛主席已明确支持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意见及“工总司”“五条”，但市委一直封锁这一消息，再支持拉出一支“赤卫队”。这明显是在分裂工人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果群众知道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就会做多种选择。叶永烈是故意忽略这一背景。

至于“王洪文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还说“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兴亡》第467页）等，都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既然正儿八经召开“司令部会议”（“工总司”从来没这个会议），到底采取哪些“吃掉赤卫队”的措施？我是“工总司”常委，可以明确地说，工总司从来没有开过对付赤卫队的会，无论是常委会，还是大会。“工总司”对赤卫队态度始终

是一致的，即认为是受市委蒙蔽的。当时众多的“工总司”《通告》、《通令》、《造反报》的文章，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直到赤卫队挑起“康平路事件”，造成铁路瘫痪，大批工人停工半停工，几千人上北京，十多万人离岗，造成上海经济严重破坏时，也仅仅批判一些坏头头。对广大赤卫队员，我们还是发通令，不许歧视不许刁难，不许停发工资，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来。这些当时全上海都知道。

叶永烈编造“紧急常委会”，要对付赤卫队，要“吃掉赤卫队”，那么为什么常委会上做了什么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却一条也提不出？这是在故弄玄虚！

十三、关于“康平路事件”

不知何故，叶永烈忌讳用“康平路事件”一词，而用“急令耿金章回沪”作为小标题。这节里又是多处编造和想象。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赤卫队”刚刚成立，采取的一次重大事件，是直接由“赤卫队”一平挑起的。可以说自这次事件后，上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上海一月夺权”的发生。本来这件事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后，曹等市委领导封锁这一消息，并亲自出面支持拉起一个“工人赤卫队”。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些文革一开始都是保党委、保市委、围攻各单位造反派的人组织起“赤卫队”，来批判上海市委，完全是一种策略，会上曹当场同赤卫队签了“八条”。

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认为曹对抗中央指示，另拉一派，是分裂工人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加上之前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市委常委会上批判曹，指出曹和赤卫队答应“八条”没经过市委同意，只能代表他个人，文件不能发。但曹在会上又否定了“八条”，说是赤卫队“强迫”他签的。

12月28日，“赤卫队”认为曹出尔反尔，“出卖”了他们，于是调动几万人包围康办并冲进大院，进了柯庆施、张春桥的家，但唯独没进曹的家。

于是引起二兵团、红卫军和许多基层造反派去康办反包围赤卫队，强行赶赤卫队出来。虽有推搡甚至个别动拳脚的，以及扒了赤卫队袖章才放出来的情况，

但并未发生所谓武斗，双方都是赤手空拳。

接下来就发生赤卫队王玉玺煽动几千人，並私调列车送到北京。还有大批赤卫队集聚在昆山，十万多人离岗，铁路、海运全面瘫痪，大批工厂停产半停产，对上海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在这危急时刻，又刮出一股乱许愿、乱签字风，乱发钱的“经济主义妖风”，真是雪上加霜。

可是叶永烈为了将这一切强加在张春桥和造反派头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篡改、歪曲，伪造历史。

叶说，“工总司”在12月25日大会上“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兴亡》第470页），但叶永烈却拿不出任何根据。当时“一月风暴”的文件汇编中，却有批判曹时，曹自己否定“八条”并将责任推向赤卫队，说过“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曹为什么要这么讲？用意何在？不想妄加揣测，但确实引起“赤卫队”员的愤怒。该文件汇编是1967年编的，比较接近事实。到叶这里，怎么变成“工总司”提出要“对赤卫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从众多的“工总司”讲话、《通告》、《通令》及大量的《造反报》文章都可查证，“工总司”始终认为广大赤卫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欢迎他们，不允许歧视。

在“康平路事件”中，《兴亡》编造了许多谎言。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在北京的耿金章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同日上海又打来长途，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12月27日中午，“耿金章的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轿车驶往衡山宾馆……。”“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在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兴亡》第470页）

请注意：这都在“康平路事件”发生前两天。还说，“‘赤卫队’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经开始联合行动。”

“就在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设立了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

耿金章！至此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才看穿谜底。”（《兴亡》第471页）写得有鼻子有眼，可是谁会料到全是胡编乱造！

我不知道张春桥和耿、王通电话，也从没听说过这些电话。我仅举几点事实，证明叶写的这些内容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在胡编！

1. 张春桥、王洪文和徐景贤怎么可能早在事件发生前二天就知道赤卫队要冲击康办？并已由王洪文、徐景贤在康办旁边的衡山宾馆设“指挥部”前线指挥，任耿金章为“总指挥”？叶永烈用一句王洪文得知“赤卫队还制定了新的计划”，但王洪文是如何得知“新计划”的？内容又是什么？是不是准备二十八日调人冲击市委康办？为什么时间、内容一点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证据了。

衡山饭店的28日被要包围康办的赤卫队员挤满了，王洪文、徐景贤怎么可能坐阵在衡山，还设什么“指挥部”？这完全不符合情理。事实上，王、徐从来就没有什么“指挥部”，也不存在“总指挥”。二兵团有可能调了人，那也只是二兵团的事，其它组织都是闻讯自发去的，如我们三十一棉。因为去康平路的赤卫队很多，造反派后来在干部带领下也去了一卡车人，想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工总司”根本没调过人去。

2. 1966年12月28日，听说赤卫队包围了康办，我在总部，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二十九日，我和王洪文、丁德法几个人，请小分队司机老林开车去康平路看看。那时只见各条路上都是人，有红卫军袖章的，也有造反派袖章的，还有赤卫队袖章的，车子无法通过。开到衡山宾馆时车突然熄火了，当时衡山饭店里里外外都是赤卫队，王洪文不能下车，认识丁的人不多，下去请几个赤卫队的帮帮忙推一下，结果真的帮助推了，车子发动起来后赶紧离开了。

实际上“康平路事件”发生很突然，“工总司”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叶永烈怎么能编出那么一大段离奇的“历史”！

3. 叶永烈说，张春桥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徐景贤在特别法庭上作证时讲的一句：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张春桥从北京来电“三条指示”，一要王洪文调人去打，二是大权不要落到赤卫队手里去，三是柯庆施家不能冲，并说当时向全市造反派组织传达过。

为此在我隔离审时此事被追了半年多，一直说我不老实，说徐都揭发了我还不承认。幸好过了不久，专案组一个姓王的将我的原始笔记拿来核对一件事，翻

开 1966 年 12 月的，发现确有张春桥三点指示的记录，但内容根本不是徐所揭发的那样。一是柯老家不能冲，二是不要抓人太多（当时并没有发生抓人，后来周总理下令逮捕私调列车的“赤卫队头头”王玉玺），三是造反派应该坐下来务虚（接下来“鲁迅兵团”开始进行了整风）。那是 1966 年 12 月。

4. 叶永烈《兴亡》一书，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搞清楚，比如说：“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柯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在那里。”（《兴亡》第 741 页）

市委是市委，在延安西路 33 号海格大楼，对外是挂牌的，办事机构；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应为康平路办公室）是市委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对外不挂牌的；而一百弄是华东局干部的住处，完全是不同的地方。赤卫队冲击包围的是“康办”即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故叫“康平路事件”。张春桥、柯庆施、曹荻秋等都住在康办大院里，怎么会住到一百弄去了？牛头不对马嘴。这算严谨态度吗？

5. 叶永烈说赤卫队“涌向康平路，据说要找曹算账，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条要求”。“29 日上午，曹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见了赤卫队代表。曹答应了赤卫队要求，于是赤卫队开始离去。”（《兴亡》第 471 页）仅此要求，用调三万人冲击康办吗？既然曹荻秋答应了他们要求，为什么还要私调列车将几千人送到北京，煽动十多万人离岗，向中央施压？

这段情节完全是叶永烈杜撰出来的。首先，既然是找曹“算账”，为什么冲进大院，确实冲击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而唯独没冲曹的家？至于“曹果然接见”，是根本没有事；即使有，曹也不可能重新承认赤卫队的“八条要求”。不仅全市造反派反对，而且市委常委会也明确不同意，曹只代表他个人。这种情况下，曹怎么可能出来“接见”，表示重新承认八项要求？

叶永烈说：“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叶永烈没提出任何证据，实际上是根据徐景贤在特别法庭揭发时讲的，而且说是王承龙向他汇报的。

特别法庭开庭那天，我们在提监桥监狱，因为还未判，被编在十一中队，专配一只电视机收看审判实况。王承龙关在我隔壁，当徐景贤揭发到这一节时，他大声吼骂徐景贤：“放屁！我自己也没去康平路现场，怎么向你汇报？一派胡言！”徐的证词都有伏笔。据我所知，根本没有 91 人受伤。当年对康平路事件有报道、总结，还搞了一个“一月革命”展和文件汇编，造反派的小报发表了许多通讯文

章，均未提及伤 91 人的情况。当时双方都赤手空拳，推搡、拉扯是有的；有的拒不撤出，动作粗点是存在的，但不存在 91 人送医院治疗的事。叶永烈如有证据，为什么不将那些医院的治疗记录公布出来，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欲加之罪就凭一句话，这种写历史的态度太不严肃了。

十四、赤卫队蓄意破坏，经济主义妖风，上海的经济发生严重危机

“赤卫队”被从康办赶出后，以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王玉玺为首的赤卫队煽动一些队员去北京，并利用调度的职权私调列车送“赤卫队”北上。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紧接着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全线瘫痪，物资积压，数万旅客滞留等等。叶永烈不得不承认，实际情况更严重。上千家工厂停工或半停工。除了北上的，各单位还有数以十万计的赤卫队既没北上也不上班。发电厂的煤最低存量只够用三天。

所有这些，稍有思考能力的都清楚，这是赤卫队总部一些坏头头干的，背后自始至终有曹荻秋和一些市委领导人支持，港务局还出现党委书记亲自调人煽动赤卫队北上……

如此明显的历史事实，《兴亡》一书中却说：“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兴亡》第 473 页），历史就像泥巴，任作者捏造。周总理曾下令逮捕私调列车的王玉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

就在赤卫队大批北上，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的急危关头，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上海又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许多党委乱签字，乱承诺各种名目的福利、工资、奖励，上海经济雪上加霜。叶永烈无视造反派采取各种措施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发动全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纷纷延长工作时间，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上海仍按计划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市委在“经济上放宽一点，政治上主动一点”指导思想下，发了许多经济主义的文件，什么支农工回沪，补发工资等等，有权签字乱发钱的正是市委和各级党委当权派。可见叶永烈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将刮起这股经济主义妖风的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

1. 说刮经济主义风“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那个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戴从来没有参加“红色工人”造反队，更没有当什么司令，一直是工总司常委（这方面我前面已讲过了，完全是叶胡编出来的。

2. 说“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兴亡》第497页）

这完全是两码事。党中央、毛主席支持工总司后，市委批了一些红布，刻了几个图章。这和后来的经济主义妖风，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在全国各省市，许多红卫兵及群众组织获批准后，政府都发给必要的经费，怎么没有发生像上海那样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呢？

3. 关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几天后的《紧急通告》，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并向上海“工总司”等群众组织发来贺电，发表《人民日报》社论，充分肯定，要全国效仿，称之为“马列主义大字报”。

叶永烈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上，费尽心机进行歪曲。叶永烈伪造大段对话，甚至伪造王洪文向周总理打电话。以下仅举几例说明事实真相：

1. 叶说，起草《告全市人民书》的那次东湖招待所会议，“是陈丕显秘书打电话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事实是，当时大批赤卫队擅离生产岗位，上海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数千赤卫队聚集在昆山，要上北京；二兵团派人去阻拦说服动员大家回上海，结果没成，还险些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赤卫队听市委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群众组织去动员，效果适得其反，必须由上海市委出面做工作。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听到说曹荻秋不行了，江青（又一说是周总理，我是听王秀珍讲的是江青）叫陈丕显出来，把工作抓起来，给他一个机会。叶说是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叫他出来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总司和红革会等其它几个大的群众组织在东湖招待所开会，并要陈丕显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督促上海市委派干部迅速做好赤卫队工作，动员昆山一批“赤卫队”回来，要他们尽快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次会议，王洪文和我等都参加的，是直接当事人，何来陈丕显打电话通知王洪文来开会？这就变成是陈丕显召集的了，不是事实。其实是“工总司”和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以及首都红卫兵一起商量定的。

叶在文中一会儿说张春桥几天前给王洪文打电话，告知周总理要陈丕显出

来，后来又说“王洪文给总理打电话证实是否周总理指示，总理秘书证实了是周总理指示，企图抓陈丕显伪造总理指示。”（《兴亡》第489页）

且不说当时王洪文不可能与总理通话，王根本就不知道总理电话。还有，难道王洪文连张春桥的话也不相信？

叶又说：“王洪文会议开完便拂袖而去”。事实是，那天陈丕显在大家督促下，确实派了市委干部去昆山做赤卫队工作，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一同去昆山协助做工作，怎么叫“拂袖而去？”

书中又说：“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叶在这里用了“有人提议”的说法，与陈丕显回忆录及其它众多写文革史文章不同。那些文章中直接就是“陈丕显提议”。叶这样写，会使读者认为，既然会是陈丕显召开的，那么这会上拟一份文件当然也就是陈的主意了。事实是，当上海市委同意派人去昆山做赤卫队工作后，会议就完成了。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时，陈丕显已不在场，与会的一些红卫兵认为，仅去做工作不解决问题，还有大批没去昆山也没去北京的不上班职工。应该全市动员，拟一份《告全市人民书》。拟好后要印刷时，因当时报社还是在市委控制下，必须要市委同意才肯印，这才又找陈丕显签字印刷的，那时他不签也不行。怎么变成是陈丕显的“功劳”？关于《紧急通告》，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充分肯定并发过贺电和社论的。

叶说：“尽管事实上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毕竟这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又说：“耿金章指着朱永嘉说，秀才你来起草，朱永嘉根据代表们意见一条条记下来，凑出十条，写出《紧急通告》，陈丕显作为市委代表也签了字。”好像锦江会议就是专门搞《紧急通告》的会议。

注意，这里没用官方及陈丕显自己所说，这次会议是陈召开的，而用“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兴亡》第498页）会议是谁召开的，开什么会，谁叫陈丕显去参加的，叶都回避了。陈“作为市委代表也签了字”，那么陈在什么文件上签了字？为什么不以市委名义发正式文件，那样效果不是更好？按理说叶应该看到过那份《紧急通告》，如实地公布出来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事实是，当时十几万赤卫队离岗，铁路中断，上千家工厂停产或半停产，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上严重的经济主义风，滥发钞票、福利，将工人运动推向经济主义。这时虽发了《告全市人民书》，那只是解决赤卫队回沪问题，仍刹不住

经济主义。工总司也曾发过通告，将海港书记李广等十几个局负责人找到杭州路小学（工总司总部）来做工作，责令他们不要再乱签字，乱许愿。因为能刮起这股妖风的主要是手里还有权的当权派，所以效果不明显。

在这紧要关头，“工总司”、红革会、交大反到底及北京红卫兵等研究认为，市委不出面，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决定在锦江饭店（一说在北楼九楼，一说在锦江小礼堂，我记得是在锦江小礼堂。据叶昌明原始工作日记记载，是锦江小礼堂），通知市委、市人委部、委、办负责人到会，并要陈丕显参加，要他讲讲话。会议目的就是要这些大员，从源头上制止经济主义的蔓延。

会上主要分析经济主义情况和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目的就是要市委明确表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不允许再乱签字，乱发经济主义的文件。会议虽然紧张但气氛还是很好的，会上陈丕显也表了态。我参加了会议全过程。有些批评虽然尖锐，但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没听任何人站起来批斗的情况。与会的部委办负责人也都表示有错，回去一定做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

但是，市委陈丕显在会后，未表态要形成一个刹经济主义妖风的正式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市委指示劳动部门召开会议，高效率地一天形成两个经济主义的文件，陈丕显不知道？难道是“巧合”？

会后，大家感到市委不下正式文件，问题难解决，决定再拟一个《紧急通告》。同意移在衡山饭店开会，而不是在锦江饭店。与锦江这个会虽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文件是由交大反到底等红卫兵起草，不是耿金章叫朱永嘉起草的，但朱参加了，也一起议论。签字的是上海工总司、红革会、交大反到底及首都红卫兵等三十多群众组织，根本不存在陈丕显代表市委签名的情节。陈丕显虽也签过字，那是在草拟后付印时，要陈代表市委签字才行，这才找陈签了字去印刷。按内容，在那种情况下，陈丕显很难推却，不答应也不行。和《告全市人民书》一样，陈签了“同意。印二十万份。”仅指同意印刷而已。

关于紧急通告，叶又捏造说：“《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是把矛头对向群众，给一些组织造成困难……”。（《兴亡》第498页）

实际情况是，王洪文和上海工总司对经济主义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不仅在三十一棉召开过各区、县、局工总司联络站负责人会议，动员大家坚决抵制。在

发《紧急通告》之前几天，工总司就发了刹经济主义的《通告》，在《造反报》上发表大量揭露经济主义的文章，这些都是很容易查到的史实。叶永烈这种毫无根据的编造，用心不良，是政治秀！

十五、关于上海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叶永烈在写“上海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时说：“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兴亡》第504页）又说：“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了“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都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同上）

这里，叶永烈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对挽救当时上海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赞扬，发表社论，将这一做法提高到夺权高度，加以号召。叶永烈却说“毛主席只说知道了”，“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同上）事实是，“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确实是在《紧急通告》的第二天讨论的，同《紧急通告》一致，是进一步挽救上海经济的一项具体行动措施。

在靠近东湖招待所的巨鹿路371号，工总司“八革会联络站”（军工单位，“八一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工总司为首，联合上海、首都红卫兵等一些组织发起的，工总司派王明龙参加，王洪文根本不在。怎么搞到广东路去了，而且是王洪文“召开”？这不是事实，是胡扯！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成立，正是应对当时赤卫队大批离岗，市人委生产指挥系统不仅放弃生产指挥权，而且有些党委带头煽动群众离岗北上，造成大量港口物资积压，外轮停港，火车中断，数千家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发电厂用煤最少时仅能维持一天半的用量。经济被严重破坏，情况异常紧急。以此来抵制文化大革命，对党中央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单位的群众已自发接管了生产指挥权，使生产能正常运

行，有大量事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比较突出的是“六局指挥部”，由港务各局，海港、交运等六个局的造反派联合组成，主要目的是统一组织海港等港务、交运系统的生产指挥，迅速解决压港、压船和铁路交通堵塞的情况，取得显著效果。但由于“六局指挥部”只限于港务、铁路交通，不能对全市的工业生产起到指挥作用。在六局指挥部基础上，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对全市的工业交通形成统一指挥。当时的口号叫“造40万吨反”，指解决港口积压的40万吨物资，设办公室、联络组、组织组、宣传组。仅仅几天，上海发生巨大变化，火车正常运行，停船全部起航，40万吨物资全部疏散，工厂生产迅速恢复正常。“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根本没涉及公安、司法等其它系统，也没涉及市人委机关，仅仅为了挽救上海经济，接管了部分生产指挥权，哪来“要抓什么人，公安局就抓什么人”，完全一派胡言。叶永烈讲得出火线指挥部指挥公安局抓什么人的例子吗？

叶永烈说：“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了通告，什么事准许，什么事不准许，大家都照办。”为什么不拿出证据，说明哪些不该准的事准了，而该准的不准了，有吗？没有！火线指挥部是发过不少通告通令，对那些放弃生产指挥，煽动工人离港搞“三停”制造混乱的干部，对那些无视中央指示，肆意滥发钞票的干部，难道不该批评他们错误行为，揭发他们的阴谋，甚至批判制止他们的破坏行为？

《兴亡》编造历史居然编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头上，说毛主席对上海工人群众接管生产指挥权，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只说“知道了，并没有太大兴趣”。经历过那个历史年代的人，几乎家喻户晓，毛主席党中央对上海接管给予过高度评价。毛主席还说，“上海工人自发接管好。”并且指出，接管后具体事务由他们去搞（指原来的干部），工人负责监督。为此，党中央下发文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发表大量社论、文章，给予高度赞扬，并且将上海这种接管上升到夺权斗争来肯定，号召全国学习上海。这些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历史事实，怎么偏偏叶永烈失忆了？！

【随笔】

革命语境下的粪便

胡庄子

粪便的问题，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但在史书上、在宣纸上、在艺术中，很少见到记录和表现粪便这类事情的，反正《诗经》上没有，《论语》上也没有。许多识文断句者，宁可谈谈小猫小狗、喝茶喝咖啡，画画小鸟小草，也不让笔头着“粪”。1960年1月，邵宇说：“有些重大题材永远也不能成为艺术上的表现题材，如庐山会议或大粪积肥。”邵宇的这句话有代表性，可见文人们对于粪便的态度。所以，文人面对粪便，保持沉默。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于粪便十分熟悉。据萧瑜1959年出版的《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说，小时候毛泽东经常往田地里挑粪，曾在半天里挑了十五担子粪。《毛泽东生活记事》（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记载，毛泽东求学时曾受到富家子弟的欺辱，有人当众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草鞋呢，脚上有牛粪哩！”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不小。

毛泽东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关注到了“粪”的问题。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专门说到了“粪夫清道夫”。说“他们除了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属于无产阶级，是共产党人可以依靠的阶级。1933年，毛泽东在《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中指出：“发动儿童参加劳动：第一，由某同志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如此细致地谈到拾粪之类，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发现书本的故事中“没有耕田的乡下人”。毛泽东是个读书人，他可能也发现了文学文艺中没有庄稼人和庄稼喜欢的牛粪等。所以，毛泽东多次要求，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并且鲜明地提出“牛粪”、向茅坑学习的问题。——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是不忌讳俗语俗字的。

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同志们，你们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

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时删掉了这些话。

关于粪便，毛泽东最著名的话出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还说：“你们出去打游击，要学习，读的是无字书，一本‘无字天书’，看到什么就跟着什么学习，如果我们跟房子学习，不跟石头学习，走得不好，就是一跤，把牙齿碰掉两只——石头反对你。所以我说，要跟山学，跟水学，跟树林学，还要跟茅厕里的大粪学。你说，大粪有什么学头！不学。它就请你一跤跌进去。”（《人物》杂志2000年第9期第54页）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说，1952年毛泽东到黄河领域某地视察工作，曾一脚踩在牛粪上，毛泽东笑起来。这一刻，他的心可能已经回到童年。叶子龙说：“他最开心的一笑，是踩在牛粪上那一刻。”

民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庄稼有三宝：厕所、粪坑、猪圈一样少不了。”乡村里生活的农民，对于粪的态度从来不排斥，他们会主动地把人的粪便、动物的粪便，收拾起来，叫拾粪，再上到田里，以肥庄稼。民谚说：“一堆粪，一堆粮”，“地生百样花，全凭粪当家。地有百样巧，粪是无价宝”。拾粪的事情是乡村最普通的事情之一，大概每一个乡村人都做过的。有人还在拾粪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谚语：“拾驴屎，瞅上坡；拾牛屎，瞅草窝；拾人屎，背道角；拾狗屎，杈道豁。”

在毛泽东的语境下、在革命的语境下，每个人对粪便的态度，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甚至成为一个事关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些识文断句的人、那些城里人，不是以粪为不洁之物吗？毛泽东就是要往那些认为牛粪不干净的人身上抹一把牛粪，通过弄脏他们的身体，纯洁他们的心灵。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牛粪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成为“干净”与“不干净”、“改造”与“未曾改造”、“感情起了变化”与“感情没起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这一说，还真有效果。于是，我们在洁白的纸页上看到了粪便的大量记录，在“艺术”中“拾”到了“粪”。

新中国曾经树立一个掏粪工人典型，叫时传祥，当了北京市劳模。刘少奇主席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上接见过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话说得叫人的脑袋一时间转不过弯来。一位知名画家的脑袋转过了弯，不失时机画了一幅《刘少奇与时传祥》。

在领袖的思想影响下，在革命的语境下，人们对粪便的认识随之发生彻底变化。人们极力淡化或忘却粪便的“臭”，深入挖掘粪便的“香”。尽管粪便是臭的而不是香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一些与时俱进的歌谣提出了粪便是“香”还是“臭”的问题——

《攒粪》：金尿罐，银粪筐，驴屎蛋子往里装，地主看见他嫌脏。问问你：吃的馒头香不香？

——《中国歌谣资料》第二集上册第191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拾粪》（陕西省）：拾粪，拾粪，娃娃有劲。拣的是脏的，收粮食是香的。

——《中国儿歌选》136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9月编印。
本文中其它歌谣均选自《中国歌谣资料》及《中国儿歌选》，以下注释略。

粪便的作用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得到高调宣传，以儿歌为例——

《拾粪》（福建民歌）：金粪筐，银粪筐，珍珠宝贝往里装。勿嫌臭来勿兼脏，秋后粮棉堆满仓。

《儿歌》：小粪缸，四方方，拣了粪来往里装。一粪筐，两粪筐，十天就满一大缸，家家粪缸满，社社谷满仓。

《拾粪》（河北省郭鹏，1958年12月）：金粪耙，银粪筐，身背粪筐手拿

耙。张开小嘴笑哈哈，大小粪蛋都勾上，留给麦苗儿当干粮。麦苗儿吃得饱又饱，一天就变一个样。

《拣狗粪》：儿童团来儿童团，莫怕热来莫怕寒，一早起来拣狗粪，晏昼下昼把柴搬。——这首江西儿歌好像是毛泽东关于“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指示的回应。

我记得《说文》还是什么书上说，“粪”字，看似浊恶，内含清隽。《庄子》说，道在屎尿间。毛泽东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粪便的态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来解决：它事关“有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最臭》写道：

学校进行大扫除，林华和杨明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等待分配任务。当林华和杨明被安排到打扫厕所时，就产生了一个活思想：“臭”。但他们立即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自己的活思想，使他们认识到：怕脏、怕臭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能有半点私心，不能挑挑拣拣。于是，他们俩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臭思想，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消灭了蚊蝇的孳生地，搞好了卫生工作。虽然他们在打扫的过程中闻到了一股臭味，身上溅到了一些污水，但他们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林华和杨明说得好！的确，厕所里是有臭味的，但更臭的是怕脏怕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两位同学不仅扫掉了厕所里的脏东西，更重要的是扫掉了自己思想上的“脏东西”。……（《红小兵小评论选》第35—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5月版）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心路历程。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历程。

李辉的《怎一个“求”字了得》一文中，摘引了当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一

份总结，其中说到哲学家任继愈下放到农村后拾粪的事情：

原宗教所副所长任继愈开始被（背）粪筐也觉得不好意思，拣粪只拣牲口粪，一次遇到一堆人粪，拣不拣？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起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克服了怕脏的思想，终于把粪拣了起来。

小学生的心路历程与大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十分相似，不知道这是当事人的真实心理，还是笔杆子的妙笔生花。

那时节，经常可以听到大家大声赞美那些珍惜粪便的人——

放了学，没事干，背上粪篮把粪拣，村前村后转一圈，拣了满满一大篮。妈妈夸我是好孩子，社长夸我是好社员。（《背上粪篮把粪拣》，河南省方沛）

树枝上喜鹊叫喳喳，树墩上人儿笑哈哈。我当是谁家迎新人，原来是女学生把粪拉。爷爷摸着胡子说了话：“我老汉活了八十八，没见过拉粪的是，大学堂的女娃娃。”奶奶伸手把爷爷拉，“死老头子脑子还是死疙瘩。”（《大学生拉粪》，陕西省杨志高）

“老公鸡，你还啼？我们已早起。我家拣了一筐粪，你才催人起。今天你算落了后，我和爷爷数第一。”（《我和爷爷数第一》，吉林儿歌）

韩羽有一幅画叫《一泡牛粪》，题材是少见的：只见画面上，两个儿童，举着粪筐，立于牛后，翘首以待。画面诉说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往事。韩先生注曰：“现在的孩子恐怕看不懂这画了。这是我小时的写照。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什么？告诉你吧，是一泡牛粪。为了争抢这牛粪，竟如此挖空心思。”（《书屋》杂志2004年第10期）韩羽除了描写当年拾粪的画作《一泡牛粪》，还有一篇文章叫《捡粪》。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将一切推向极端的年代。那时节，粪便对人思想的改造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许多人被勒令去扫厕所。铁肩担大粪，妙手扫厕所。文革中专职扫厕所、与粪便打交道的“牛鬼蛇神”为数不少。

杨绛在学部文学所工作，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她没有名位也不掌权，只是一个陪斗者的角色，完成陪斗的任务之后，主要工作是清理两间厕所。这两间厕所原是文学所领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小刘的工作，如今颠倒过来，小刘负责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妇女中拿最高工资的杨绛负责厕所卫生。杨绛对这个工作很负责任。她回忆说，受领任务后，“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篾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除掉多年积污，虽有破损，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

画家叶浅予回忆说：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叶后来还画了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说：“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专访刘震云：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南方周末》2009年6月15日）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回忆说：“我和郑天挺等人编在一个劳改队。这个队有十多个人，主管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郑先生打着三角旗走在前面，我推着垃圾车跟在队尾。郑先生穿着一双破布鞋，表示与劳苦大众走同样的路，但走起来不跟脚，显得拖拖拉拉，我们也都跟着缓步而行。”“那时什么批斗、游街、劳改、喷气式飞机、罚站、拳打脚踢，我什么都受过了。后来让我劳动，打扫校园，扫厕所。我们也有贡献，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新京报》2008年12月5日）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说：“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朱强：《逝者：硬骨头教授贾植芳》，《南方周末》2008年5月6日）

翻译家杨宪益说：“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把便盆上残存的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夸奖。外文局的厕所，成为最美妙的厕所之一。”（徐虹：《杨宪益：在癫狂中安宁》，《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16日）

作家沈从文曾负责清扫厕所卫生。黄永玉回忆说，沈从文除每天接受批斗之外，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的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沈从文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是道德上可靠。”

钟惦棐在五七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并且创造出的一套清理厕所的工具，将厕所卫生整得纤尘不染。干校结束时，让每个人填写履历表，其中有特长和志愿栏，钟在特长栏里填写了“电影理论、掏厕所”，在志愿栏里写的是“清洁工人”。

历史学家周谷城被安排扫厕所。一天，毛泽东问张春桥：周谷城现在干什么？张说：打扫厕所。毛泽东说：喔，打扫厕所也是革命工作嘛。（孙言城：《复旦二周》，《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第119页）

上述文字都是文革后的记忆与回忆，其中有自嘲更有讥讽。缺的是他们在扫厕所、面对粪便时的心理活动。好在当时的文献中有一些记载——

诗人邵燕祥在1968年5月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说：

我过去在下乡时，在劳动中，还自认为是不怕脏的，但在城里，则考虑到身沾污泥，好像就不体面了似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又重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最高指示。现在反省自己在劳动、生活中是“脏”的，是生怕“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过去下乡时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间似乎“不怕脏”，也只是一种假象，一回到城里，则要恢复并坚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了。进一步看，即使真正做到“不怕脏”（生活上、劳动上），也还未解决问题的要害。只有感到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比一切污泥浊水、牛屎粪尿还脏还臭时，才为思想的飞跃准备了条件，才是感情起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第168—169页，邵燕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中，列举了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粪便时思想态度的转变：

原国际部有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外长住11年之久，学了一套西方生活方式，人们称他“西方绅士”。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练，思想感情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过去坐飞机“云里来，雾里去”，现在在生产斗争中“风里来，雨里去”；过去怕脏怕臭，现在用手拣马粪，他说：“没有大粪臭，就没有稻谷香。”（《全面落实两个“决议”，把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总五七干校开展四好运动的情况》，《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98页，1971年2月编）

冶金工业部的工程师杨世祥通过五七干校的劳动锻炼，思想水平有了提高。他说：“猪粪、牛粪虽臭，但可拿来肥田。我们头脑里的臭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比猪粪、牛粪还臭。”（冶金部五七干校九连党支部：《关于团结、教育、改造老知识分子的体会》，《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114页）

老工程师陶恩瑞原来是怕苦、怕累、怕脏、怕死的典型。过去在机关里养尊处优，从不参加劳动。这次下放劳动出了不少洋相。他在修河劳动中，怕苦怕累，到处抢轻活干；在猪圈劳动，穿着长统靴，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惟恐猪粪尿溅到身上；在大田里施化肥，也要戴白手套。我们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帮助他，使消极向积极方面转化。一次积肥时，他主动拿起粪勺来掏粪。在给玉米施肥时，他也不戴手套，敢用手抓粪肥了。（冶金部五七干校九连党支部：《关于团结、教育、改造老知识分子的体会》，《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119页）

诗人臧克家被下放到湖北向阳湖五七公社劳动，他写道：“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还通过诗歌的形式介

绍了他对粪便认识的巨大转变：“闻臭捂鼻过，见粪欲翻肠。洁白旧时手，难掩脏内囊。肩挑屎尿水，不怕溅衣裳。涓滴灌菜园，视之若琼浆。”（臧克家的这两首诗写于1975年。见李城外编《向阳湖诗草》第32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1版1印）

“革命”（极左）时代的人们，在遇到粪便时，努力在排除对它的厌恶感、排斥感，积极在心理上接受它、认可它、欣赏它、赞美它。那些“革命”的领导者，则把别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城里人、官员）对粪便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思想的试金石。对于粪便的态度，成为检验“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分界线。

——粪便，成为“革命”时代的政治符号。

如今，笼罩在粪便之上的意识形态早已被抛弃。

我们回归常识：粪便是臭的。

但是，革命时期人们对粪便的态度与认识，却不能不让我们深长思之。

【述 往】

李斌，著名肖像画家。1949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受省政府特批，作为特殊人才调入省美协任专业画家。1980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2—198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学习。1985年参加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同年参加全国黄山油画讨论会。1987年赴日，于东京艺大油画系学习一年。1989年参加亚太艺术教育会议赴美，1997年入美国籍。代表作：《换了人间》、《梦境——正义路壹号·北京1981》、《424 晴空万里·南京1949》、《共产党人·任仲夷 张志新 胡耀邦》、《共产党人·刘少奇 王佩英 陈少敏》、《我不相信·王佩英系列之六》、《油灯的记忆》系列。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李斌

一、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也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她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

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我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他见我诚恳反思着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嗅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负责押解她的红卫兵按下她的头时，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倪老师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我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又必须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甚至不会单独行为，而是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尽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楞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穿梭，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就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

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装甲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吃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何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

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二、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间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那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不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杨浦区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作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

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份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线！”从此“和父亲划清界线！”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在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打那以后，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标语。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失落于万丈深渊。

三、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

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仔细看了一眼“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收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

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四、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这儿，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们，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分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曾赴缅抗日。

三十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

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五、9.13 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哈，唯独 1971 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图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朗朗上口。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只是想让林彪彻底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刑，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六、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是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七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七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4年前，我认识了3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线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灰中一位哥们，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许多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费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我冻死掉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七、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改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美术班。负责这个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脏了。为了分脏，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

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发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得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就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模棱两可，都是不做定论。这么一来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进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开会，留在了那里。

1998年我开始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

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画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八、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思想与辱没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和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和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回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序与跋】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序与跋

启之

自序

本书所收之文，大部分因触了文网而被“枪毙”，小部分虽然侥幸发表，但也惨遭刀斧。可以说，这个集子是尸体的展览厅，残疾的修复所，言论管制的纪念碑，“胜利大逃亡”的成绩册。

有一次开会，遇到了杨、王两位搞电影研究的同仁、博导，杨导冲我嚷嚷：“嘿，你可真够狡猾的，闷头为自己写书。不像我们，为课题忙活，净说些言不由衷的话。”

我知道，他所说的，我的“狡猾闷头之作”，指的是我在港台出的书。但我不想让他在会场上道破，只好低调处理：“唉，写不好瞎写。”

可杨导不依不饶：“别装了，一看就知道，你是蓄谋已久，下了大功夫的。”

我想跟他说，“功夫是下了不少，可谈不上蓄谋已久，只能说逼上梁山——此间文网森森，我只好另谋出路。”可是，在这场合，我不想跟他多费口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谈话，就搪塞道：“你们的书是主流，学生必读。我的书是支流暗流，没人看。”

杨导拍拍我的肩膀：“得了得了，现在没人看，以后有人看。不像我们的书，应景之作，红火一两年，就成了文化垃圾！”

我嘴上说，哪里哪里。心里不禁佩服他的明达和坦率。佩服之余，不免有些腹诽：你为什么不狡猾一下呢？没人拦着你呀。老板一过生日，你就去唱堂会。主旋律一开拍，你就去捧臭脚。为了区区博导，去争那些应景项目。我不去北广（当时还不叫中国传播大学），不当博导，不为评职称写书，你做得到吗？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既能说真话、写好书，又能跻身主流，享受体制的好处……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王导说话了：“主流之所以为主，是因为它得人心。”

不跟着主流，就等于跟人心做对。再说，主流也可以批评嘛，刚才在会上，你（指杨导）不是说了主旋律的文化视域不够开阔，视听修辞还有差距了吗？咱们的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学术含量。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真话，就有价值。学术研究也不能光想着后人，都为后人写作，现在的人读什么？……”

莫言称赞对权势毕恭毕敬的歌德，诋毁桀骜不驯的贝多芬，并且还讲出了一番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我在另一本书的序言里已经谈到了，兹不赘。这里，我想说的是，王导与莫言可以并肩携手，高举“内外通吃，好处均沾”的大旗，招揽国中的知识精英，组成一个“新犬儒主义”的联合阵线。

新犬儒与旧犬儒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善于装——对学术装着忠诚，对艺术装着虔敬，对腐败装着不满，对言论管制装着看不见。他们也批评时弊，也替弱势群体说话，开会的时候，也会热情洋溢地装着呼吁求真求实，义正词严地装着声讨学术造假。可他们说归说，做归做，更不会去碰体制。他们的学术活动或艺术创作，说到底，就是以个人得失为圆心，以体制内外的好处为半径，在不得罪权势的前提下，做着不间断的圆周运动。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我算不上英雄，在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但是，即使碰得头破血流，我仍选择说真话。萨特说过：要么不写，要写就写自己就想写的。我以此为原则。

这本书说的是电影，电影是第七艺术。关于艺术，我有一点感悟：人们一直以为，艺术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不，没有自由一样有艺术，甚至有更繁荣的艺术——暴君要用它满足私欲，专制要用它点缀升平，戈培尔要用它鼓舞士气，日丹诺夫要用它表明政绩。艺术有久暂，有传世的经典，有一时的娱乐，有短命的献礼，时间就是裁判。盐碱地上虽然长不出庄稼，但总不乏碱蒿、羊草和西河柳。

按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艺术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戏剧、电影等等。假如换上另一种标准——把艺术家对待权、钱的心电图，外化为身体的姿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屈膝、俯仰、站立足以概括所有的艺术。

屈膝，可以是跪倒尘埃，匍匐不起；可以是两股战战，低头哈腰。不管是哪一种，其心思都是一样——如何讨主子欢喜。天下的主子都爱听奉承话，都爱看到自己的伟大形象，贤明如唐太宗者也免不了想杀掉直谏的魏征，无常如唐明皇

者竟会让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连任十六年宰相。所以，迎合上意就成了这种艺术的永恒主题。

俯仰，不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是“与世浮沉，与时俯仰”。这种姿态对身体头脑和神经系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说，屈膝只需要奴才的智商，腿和腰的协调，那么，俯仰则需要灵活的颈椎、柔韧的脊柱，发达的头脑，阿Q的情怀，以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俯”自然免不了摧眉折腰，与奴婢相类，但是“仰”却足以补苴罅漏，修复形象。

仰，有时是精湛的艺术，有时是爱国的情，有时是莫谈国事的超脱，更多的时候则是奶便是娘。以“奶”为底线，就免不了当一当奴才。《鬼子来了》里面的有个街头“艺术家”，日本人得势时，他在街上眉飞色舞地说评书——

众位安静请压言，
咱不论古说今天。
皇军来到咱家乡地，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皇军来了救苦救难，
咱应该大开门户如迎亲人一般。
八百年前咱是一家，
使的一样方块字，
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
“八格牙路”我不见怪。
往后哇，“米西米西”皇军他给，
皇军和咱亲密无间。
乡亲们往后不用受穷苦，
“约西约西”，“大大的约西”笑开颜。

日本子刚一投降，他马上有了新词——

硝烟散去万民欢，
中国人抗战整八年。

.....

打得小日本蹶着屁股撂着蹶子地跑，
他们跪在了国军的面前举着个双手，
哆哩哆嗦缴械投降浑身打颤，
嘴里头说：“我的八格牙路干活！

你的三宾的给！”

这就是小日本侵华可耻的下场，
我们迎来了和平胜利的这一天，
看今朝山河光复多灿烂。

.....

《法门寺》中的贾桂虽然站着，其实时刻准备跪下。所以没跪下，是因为主子最近想起了人权的缘故。艺术分等级，有钦定的样板，有精英的好恶，有民间的口碑，公道自在人心。俯仰不是站立，俯仰的艺术是骑墙的艺术，犬儒的艺术，投机的艺术，随波逐流的艺术。它们不能长久，尽管俯仰艺术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

站立的艺术，人人都懂，知易行难。站立，是人与猿的区别，是人类进化的终点。如果说，“屈膝先生”用大肠代替大脑，“俯仰君”靠脊椎指挥行动，那么，“站立者”则以颈上之物决定行藏取舍，其作品多真实，尚批判。因其真实，故而久远；因其批判，故而深厚。

为作品出生，“站立者”也须俯仰——向权力妥协，与孔方周旋，或令真实褪色，或请有司宽松，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他深知，权力随时可以翻脸，把他和他的艺术打入死牢。他明白，没有财神的滋养，艺术就会枯萎，以至胎死腹中。但是他有一个不变的宗旨：说真话，说不成真话时不说假话；非说假话不可的时候，蓄须养志，如梅兰芳。因为抱定这个宗旨，站出来的作品，总是难得问世。委屈辛苦一场，名位财色统统泡汤。古今中外，肯用这“四大皆空”来换取此类作品者，少之又少。

由此可知，一部艺术史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站立者”与“屈膝先生”各守那尖尖的上下两端，圆滚丰满的中间部分则由大大小小的“俯仰君”占据填充。同属“屈膝先生”，古今不同。古人愚拙，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就是奴才；自己的艺术是“奴婢的艺术”。今人聪明，当了奴才却以主人自居，且引经据典，证明奴才的艺术就是主流，就是主旋律。“俯仰君”对此不肯苟同，仗着人多势众，给奴才以冷面，给大众以媚眼，向主子争正统，向缪斯发声明：俯仰是艺术的最高哲学，从三皇五帝到于今，艺术就在俯仰中求生。因此，没有俯仰就没有艺术；俯仰艺术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俯仰艺术家才是艺术史上的中流砥柱。一味屈膝下跪，迎合上意，是封建主义，是习惯势力，既有损于形象，又不利于“双百”。只图挺胸昂首，身心舒畅，是个人主义，是崇洋媚外，既有违于现实，又不利于和谐……。出于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考虑，主子允其请，于是，奴才听命，大众附和，站立者愈寡，俯仰艺术大盛。

基于这种认识，我给这本书的书名定为“有梦楼随笔”。“有梦楼”对应于张中晓的“无梦楼”——毛泽东时代一路无梦，后毛时代有了，梦发财、梦升官、梦出国、梦移民、梦有房有车、梦五个一工程奖……，我的梦是说真话而能出版，这个梦只能在大陆之外实现。可是，对于港台的人来说，我之宏愿早已是陈糠烂谷。所以，人家要我改名。以便让读者一目了然，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

想来想去，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从1987年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至今，我已经在电影界混了三十多年。N年前，电影家协会就要我填表，先是会员，后是什么理事。这些表格都被我随手扔了。上大学的时候，还不知道陈寅恪，更不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念兹在兹的只是“人生贵在适志”。三十多年来，适志的事情少，拂意的时候多，而这本书则是少中又少者。

作者谨识于

北京樱花园

2013-1-6

跋

十年前，国内某出版社要出我一本集子，我很当回事地编成了。人家说，一定要用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以免审查出事。于是，我暗下决心，早晚有一天，要让这些文章的全版问世。结果，这本集子到现在也没出来，而它的全版却在海峡对岸问世了。

在写这本书第一篇小文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陋室孤灯书满床，
百年风雨啸南窗。
驰骋影史追心史，
笑骂文章论典章。
盛世仍濯沧浪水，
清平还赋零丁洋。
漫言前途无知己，
人海茫茫一心香。

虽然迟了十年，心香仍在。谨将它献给读者诸君，献给为此书操劳的秀威的朋友们。

作者谨识于
北京樱花园
2013-1-6

【编读往来】

1. 李邕纠错

《记忆》编辑部：

黄金海文章中说“安亭事件”时，潘国平不在现场而在南京，这是一个大差错。黄金海是安亭拦车事件发生后才去现场的。之前他胃疼，没有去火车站，因而没有在第一时间去安亭，没有经历拦车行动。他是第二天去的，所以对有些事不一定完全知道。事实是，潘国平是和王洪文一辆火车，被停在安亭，而且自始至终都在安亭。张春桥到安亭后，潘国平参加了谈判，而且是张春桥谈判的主要对手。至于去南京，那是后面的事情；是文化广场谈判后，张春桥要他去南京，将还有一批留滞在南京的人劝回来。

李邕 2013年10月1日

2. 陈闯创指出注释的问题

《记忆》编辑部：

贵刊选择对每页的脚注重新编码，这就给编辑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后面某个注释同以前的注释出处相同，就要转换作者原来的注释说。如：102期李红云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除第一次引用该书时作者介绍了书名外，以后引用都用“同注7”代替此书。而因为每页重新编码，结果根本找不到“注7”，如第6页、第10页的脚注“同注7”实际上指的是第4页的脚注3；类似的还有，兹不一一。我建议以后在编辑pdf前，先把注释上的“同注××”替换为来源名称，免得出现遗漏。

陈闯创

3. 启明谈李逊文章

《记忆》编辑：您好！

贵刊102期刊载的李逊的《上海工厂里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是篇好文章。它与同期的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一文起到了相互映证的作用。如果说黄金海的文章有为部分工人造反派文革时期作为进行解释、辩白的动机，李逊的文章则能够引导读者从事实出发，在客观的立场上读解王洪文、王秀珍等这些工人造反派起家的部分政治动因。

李逊文也同时让我体悟到什么是不预设立场的客观历史研究，看到这样审慎的历史研究与对历史人物预设政治立场的传记文学的重大区别。

我希望今后多从贵刊读到这样的好文章。

读者启明

4. 郑文生询问金祖敏情况

《记忆》编辑部：

102期李逊介绍上海文革时期造反派的文章，金祖敏一段为何写得如此简略？是没有采访完还是其他原因？在改革开放后，文革中风头强劲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几乎全军覆没，我很关注这些人覆没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和后来的状况，能将金祖敏的情况再补充些吗？

后学：郑文生

5. 余汝信纠错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02期刊载武传斌的《风雨苍黄三十年》，很有意义。惟因年代久远，武的回忆恐也有失准之处，试举三例如下：

1. 关于广州三司

广州三司的全称，应为“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而非武司令所称“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与武司令所述相近的，是“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广州红一司。三司的全称冗长又绕口，武司令记错并不奇怪。惟现今资讯发达，这些当年的东东，在网上一搜便应可搜到的。

2. 关于“省革联”夺权

武司令说赵紫阳被带到中山大学之后，“通宵达旦喋喋不休”，“一谈就是三个钟头，几乎通宵”，应有夸张的成分，武司令不是在矮化赵吧？而据赵本人1967年2月说，他不过是“谈了近两个钟头”，“到晚上十二时，人无法来齐了，吴同学（余注：应指武司令，当时赵还“武”“吴”不分）说：现在不能谈了，你们去休息吧。当时我们坐来的车子也给他们开走了。一直在找房子睡觉，找到三时才找到地方。”（〈赵紫阳、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谈“省革联”〉，载《红色暴动》，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出版，1967年2月27日）

2月22日，在中大的部分省委书记处书记无奈之下签字同意的是“交印”（实际是“监印”），而非“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第二天省委发出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也是非常巧妙地称：“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换言之，夺权是你们宣布的，省委还存在，我们最多只承认“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并不承认“夺权”，更何况是“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

监印协议原文如下：“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出的人手里。”在协议上签字的是赵紫阳、林李明、区梦觉、张云四人（见叶曙明：《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签字时，尹林平、张根生因故不在现场，没有签名。寇庆延并非书记处成员，无须签名。

3. 关于许世友

武司令说，“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

调来广东任职（余注：原文为“任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此说应有误。

实情是，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但并未在“广东”（包括省委、省革委会）担任任何职务。而且，1974年4月4日，赵紫阳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亦已非“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

毛泽东当年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军队的“诸侯”完全与地方脱离干系，不再干预地方工作。武司令所忆及的许、赵一并出现在会场的情景，确有其事，但并非“省革委会全会”，而是4月30日下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的广州地区原两派部分群众代表座谈会。据称，当日出席会议的“群众代表”共三十三人，武司令应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许世友会出现在这次座谈会现场？因为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时期，座谈会召开的目的，是号召他们“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一伙在广东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此事涉及广州军区原领导人，所以许才会出席并作了讲话。

余汝信

2013年10月10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